

馬克思著

吳黎平 劉雲譯

# 法蘭西內戰

世界學術名著譯叢  
生活書店發行

活生

世界學術名著叢譯

# 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著  
吳黎平劉雲合譯

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世界學術名著叢譯

# 法蘭西內戰

著者	馬克思	譯者	吳黎雲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者	生活書店
----	-----	----	-----	-----	-----	-----	------

上海·重慶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

# 目 錄

恩格斯的引言·····	(一)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為普法戰爭告歐美各分會全體會員第一書·····	(二五)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為普法戰爭告歐美各分會全體會員第二書·····	(三五)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為法蘭西內戰告歐美各分會全體會員書·····	(五一)
馬克思願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	(一三七)
列寧在馬克思致願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文中論巴黎公社·····	(一四五)

## 恩格斯的引言

要求再版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所發表的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宣言，並要我給它做一篇引言，這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所以我在這裏只能很簡短地把最重要的幾點略說一下。

在上述較長的著作之前，我更加上了總委員會爲普法戰爭而作的兩篇較短的宣言。我所以這樣做的原因，第一，因爲內戰一書內曾引證到第二次的宣言，而這二次的宣言如不同第一次的宣言合併着看，又不是到處都能明白的。其次，因爲這兩篇同爲馬克思所寫的宣言，不較內戰一書爲差地同是一種顯著的模範，表現出作者正確把握偉大歷史事變的性質，意義與其必要結果之驚人的天才（這種天才，作者最初表現於拿破倫第三政變記一書之中），而此等事變在當時或者是還在我們的眼前展開着，或者是不久才告終結

的。最後因為我們在德國直到現在還受累於馬克思所預言的那些事變的惡果。

第一次宣言中說：假若德國反對拿破倫第三的防禦戰爭蛻化爲反對法蘭西人民的掠奪戰爭的話，那末德國將要重新遭受到（而且將更加厲害）它在所謂解放戰爭（註一）之後所遭受的那些不幸，這話現在難道不是已經證實了嗎？不是我們受到了整個二十年的俾斯麥的統治嗎？不是在這期間我們所獲得的並非取締政客的辦法，而是用同樣警察的專橫、同樣可恨的法律的曲解來壓迫社會主義者的法律嗎？

難道馬克思的預言，說亞爾薩斯與勞倫的歸併『會使法國投入俄羅斯的懷抱中』（註二）說在這歸併之後，德國或是將公開變爲俄國的奴僕，或是在短期的休息之後將準備開始新的戰爭，即開始『對於斯拉夫人與羅曼人的聯合人種，進行人種戰爭。』這些話不是一個個字都證實了嗎？德國的歸併法國省份不是使法國投入了俄羅斯的懷抱中嗎？俾斯麥不是在整個的二十年內勞而無功地找求着沙皇的恩寵，並且他這樣的投拜在『神聖的俄羅斯』前面，比它還沒有變成『第一歐洲強國』之前的小小普魯士平常所做

的還要卑恭得多嗎？

戰爭的恐怖不是常常懸在我們的頸上嗎？這戰爭的第一天，必將把一切世界強國的紙上的聯合變成灰燼，這戰爭（除了它的結果之絕對不可知可以斷定之外，其餘還不能

（註一）拿破倫第一把德國底一部分領土割入法國，並使其餘部分隸屬於他。普魯士領導德國各邦與俄皇聯盟，向拿破倫第一作戰（一八一三至一四年）。

——編輯部註

（註二）引自總委員會關於法普戰爭的第二次宣言。馬克思預料到在亞爾薩斯、勞倫被合併之後法國一定渴望復仇，而且一定是在找求同盟者，第一就找沙皇制度的俄國。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馬克思寫信給索爾格（Sorge）說：

『普魯士的傻子們所看不見的，就是現在的戰爭，不能避免地要引起德俄戰爭，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戰爭必然引起普法戰爭一樣。這是我從這次戰爭中爲德國所期待的最好的結果。如果不與俄國同盟，不隸屬於俄國，特殊的『普魯士主義』就從沒有存在過，也決不能存在。第二次這樣的戰爭，將成爲俄國的不可免的社會革命之助產婦。』

——編輯部註



確定的說)必定是人種的戰爭,它必將把歐洲交給一千五百萬或二千萬武裝的士兵去掠奪。但這戰爭直到現在所以沒有發生者,就是因為它的結果絕對不能預知,所以使最大的軍事國家中之最有力者,也不能不發生危懼。

所以將這些敏銳地證明一八七〇年國際工人政策的遠大眼光而大半已為人們所忘却的文件,重新刊印出來給德國的工人們知道,實是非常必要的。

我關於這兩篇宣言所說的話,同樣是可以應用於法蘭西內戰的。五月廿八日,公社的最後保護者在俾爾維爾被優勢的敵人力量所消滅了。兩天之後,五月卅日,馬克思即在總委員會上面宣讀他的著作,在這中間,他用簡短的有力的幾點判定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他的話是如此的正確,如此的適當,使以後關於這問題的一切文獻都望塵莫及。

從一九八九年,起,法國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使後來五十年內在巴黎發生的每次革命不能不參有無產階級暴動的性質,拿它自己的鮮血做代價去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當然在勝利之後要提出它自己的要求。這些要求,多少是不清楚的與模糊的,這每次要看巴

黎工人的覺悟程度而定。但歸根到底，這些要求的目的，是在於消滅工人與資本家的階級的對抗。如何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這是他們所不知道的。可是就是這些要求的本身，雖是它不十分確定，但已是對於現在社會制度的危險。提出這些要求的工人，是武裝起來的。所以佔有國家統治權的資產階級的第一個任務，便是解除工人的武裝。所以在每次用工人的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品之後，隨着即發生新的鬥爭，這鬥爭的終結，是工人的失敗。

這事第一次發生於一八四八年。屬於國會反對派的自由資產階級大張筵宴，其目的是要實現一種使他們政黨可以得到統治地位的選舉改良。對於政府的鬥爭，使他們不能常常求助於民衆，並且慢慢地將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內急進的與共和主義的分子，提到前面來。可是在這些人的後面，却站着革命的工人，這些工人從一八三〇年起已經得到了遠比那些有產者甚至比那些共和黨所設想的爲多的政治獨立性了。當政府與反對派的關係發生了危機之時，工人們即開始了巷戰。路易裴立伯(Louis Philippe)消失了，選舉的改革也跟着它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國，而這共和國，勝利的工人們竟宣佈它爲

『社會的』共和國。到底什麼叫做社會的共和國，那誰也不知道，就是工人們自己也不知道。但他們現在已經武裝起來了，他們已是國家的一種力量了。所以當政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當他們已經相當穩定之後，第一件事便是解除工人的武裝。這工作在六月暴動中完成了。他們（指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直接食言，明顯的侮辱以及流放一切失業工人到遠方去的企圖，逼使工人們不能不起來暴動。政府已經預先保證自己有極大優勢的力量，所以工人們在經過五天英勇的抵抗之後，終於失敗了。接着就開始了自從羅馬帝國陷落前的國內戰爭以來所沒有見過的大批赤手空拳的俘虜的被殺。資產階級第一次做給人家看：當無產階級敢於以單獨的階級的資格，以自己的要求起來反對它的時候，它將如何以瘋狂般的殘暴手段來對無產階級復仇，但如把一八四八年來同一八七一年的暴行相比較，那還不過是兒戲而已。

可是，資產階級不必很久的等待它所應得的處罰。如若無產階級還不能管理法蘭西，那資產階級也已經不能，至少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能管理法蘭西了，那時資產階級的大多

數都是保皇黨的，其中分成三個皇朝的政黨，（註一）第四個才是共和黨。它的內部的相互殘殺，使冒險家拿破倫第三奪得了一切最主要的政權機關：軍隊、警察與行政機關。並且使他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註二）推倒了資產階級的最後柱石——國民會議。第二帝國成立了。（註三）這是少數政治的與財政的冒險家對於法蘭西的剝削。但同時，工業發展的迅速，是在路易斐立伯的殘暴的與懦怯的制度下，在大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絕對統治的時代所夢想不到的。拿破倫第三在保護資產階級不受工人的侵犯與保護工人不受資產

（註一）法國的保皇黨在那時分爲三派：一派是「合法派」，擁護波旁底「合法的」王朝；一派是「奧利恩派」，擁護奧利恩王朝；一派是「拿破倫派」，擁護拿破倫第三。

——編輯部註

（註二）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拿破倫第三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舉行政變，解散國民會議，一年之後，自立爲法國皇帝。參看馬克思所著拿破倫第三政變記一書。

——編輯部註

（註三）法國在拿破倫第三（一八二五——七〇年）統治的時期，稱爲「第二帝國」，以別於拿破倫第一（一八〇四——一四年）底「第一帝國」。

——編輯部註

階級的侵犯的藉口之下，取消了資本家的政權；可是它的統治，却助長了投機事業與工業的發展，一言以蔽之，助長了直到現在沒有見過的全部資產階級的富庶與繁榮。它更厲害的助長了賣官鬻爵與大批貪吝，做這些行爲的人，團集於皇帝宮庭的周圍，他們從這種富庶上得到極大的利息。

但第二帝國是對於法蘭西國家主義的號召，也就是擴張到一八一四年所失去的第一帝國邊疆，至少是第一共和國邊疆的要求。法蘭西帝國，不能永處於舊皇國的疆界之內，更不能永處於一八一五年更狹窄的疆界之內，因此就不時發生了戰爭與擴大國界的必要。最吸引法蘭西國家主義幻想的地方，就是德意志的萊茵河左岸。在國家主義者的眼中看來，萊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較之亞爾卑山或其他的地方的十平方英里，還要貴重得多。在第二帝國之下，歸還萊茵河左岸（一下子或是分次地）的要求實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這個時間，在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註一）之後，是已經到來了。被俾斯麥所欺騙並被他自己的狡猾但猶豫的政策所欺騙的拿破倫，在等待着『土地報償』之際，便自然只有出之

於戰爭之一法。這一在一八七〇年爆發的戰爭，遭到了西丹的大敗（註二）與威爾海姆斯罕的被囚。

失敗的必然的結果，是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的巴黎革命。帝國如像紙製的房子一樣傾覆下來。法蘭西又重新宣佈爲共和國了。但在城門前站着的是敵人。皇帝的軍隊，一部分被圍困在美次，沒有放出的希望；一部分則當了德意志的俘虜。因爲情形如此緊急，所以人民允許舊法國中的巴黎的議員自己組織『國防政府』。他們當然很快就答應了，因爲那時一切能負險作戰的巴黎人，爲了防禦的目的完全武裝起來，充當國民軍，工人就在國民

（註一）普奧戰爭是俾斯麥所謀劃的，爲的是排除普魯士在統一德意志時的老敵手——奧大利。普魯士在這次戰爭中戰勝了奧大利，因而保證它在德意志統一中的盟主地位。拿破倫第三在普法戰爭中保持中立，因爲他希望得到德意志諸邦底領土之一部作爲他保持中立的報酬。這是俾斯麥所答應的。編輯部註

（註二）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法國皇帝所統率的法國軍隊底主要部分，在色當（Sedan）（法國東北

部的一個市鎮）向普魯士軍投降。

軍中佔據了多數。但不久以後，差不多全由有產者組成的政府與武裝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表露出來了。十月三十一日，工人武裝隊伍佔領了市政廳，並逮捕了幾個政府的委員。政府的叛變與失信以及幾個小資產階級武裝隊伍的干涉，使被捕者得到了釋放，爲要免除在被敵所圍的城市內爆發內戰起見，還是給舊政府留下了權力。

最後爲饑餓所迫的巴黎，於一八七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出降了，但它的出降條件，在軍事上真是空前高貴的。砲台是交出了，大砲從砲台上卸下來了，兵團與別動隊（註）被解除了武裝，並且他們宣佈了自己爲軍事的俘虜。但國民軍還是保留着槍械與大砲。它只是出來同勝利者議和。勝利者並不敢奏着凱旋曲進入巴黎，他們只是佔據了一個小小的城角，其中一部分中只包括公家的公園，而且就在這裏，他們也不過佔據了幾天工夫！圍困巴黎至一百三十一日之久的他們，在這短短時期之內，反爲武裝的巴黎工人所包圍。這些工人時刻注視着，不使一個『普魯士人』跨過他們所允許給勝利者的一角之狹窄的邊界。

（註）別動隊是拿破倫第三在一八六八年所創立的預備軍，以備在戰爭時保衛城市之用。——編輯部註

巴黎的工人竟使那些法蘭西帝國全部軍隊放下武器的普魯士的軍隊對自己表示如何的尊敬呵！跑到這裏來想同革命的柱石算賬的普魯士的士官們，在這武裝革命的前面，却不能不恭敬地站立起來，而不能不對之舉行敬禮！

在戰爭期內，巴黎的工人只限於有力地堅持着鬥爭的要求。可是當巴黎被交出，訂立了和平條約之後，新政府的首領梯亥爾便不能不認清，巴黎的工人武裝着一天，有產階級——大地主與資本公司——的統治就一天要受到危險。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企圖解除他們的武裝。三月十八日他派了野戰聯隊去奪取國民軍的大砲（這些大砲是巴黎被圍時所造而預約由公家付錢的），但這一企圖沒有達到目的，整個巴黎都拿起了武器，實行自衛，巴黎與逃徙凡爾賽的法蘭西政府之內戰，就此開始了。三月二十六日選舉了公社，三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正式宣佈成立了。一直到現在，國民軍中央委員會拿了政權，並且已經頒佈了消滅醜惡『道德警察』之命令，這中央委員會把它的全體交給了公社。三月卅日公社取消了募兵制與常備軍，宣佈國民軍為唯一武裝的力量，這國民軍是包括一切能



荷槍作戰的公民的。公社廢除了從一八七〇年十月至一八七一年四月的房租，將已付的租金作爲將來應付房租之用。它更制止了抵押於城市當舖內的物件的拍賣。同日，批准了當選於公社的外國人爲公社委員，因爲『公社的旗幟，是世界共和國的旗幟。』四月一日決定公社辦事人員以及公社委員的薪水，不得超過六千法郎。次日宣佈了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取消了國家對於宗教事務的費用，把一切教會的財產轉爲國家的財產。四月八日更通令把宗教象徵、標本、教條與禱告等等——總而言之，即把『一切有關個人良心的東西』從學校中驅逐出去，這一通令就逐漸被實行了。凡爾賽軍隊每天槍殺他們所捕去的公社的擁護者。所以在四月五日就頒佈了命令扣留抵押者，可是這一命令是從沒有被執行的。四月六日在羣衆的狂歡之下，國民軍的第一百三十七營拖出斷頭台，把它當衆燒毀。四月十五日決定破毀在一八〇九年戰爭後拿破倫用敵人的砲鑄成的，並爲民族侵略主義與民族仇視的象徵的凡東場上的凱旋柱。五月十六日實行了這一決議。四月十六日，公社命令登記一切爲工廠主所拋棄的工廠，製定了將他們交給這些工廠工人合作社去管理並

將這些合作社合併爲一個總社的計劃。四月二十日取消了麵包工人的夜工，消滅了工作介紹所（自第二帝國起以來，這是警察所指定的對於工人的頭等剝削者的專利）工作的介紹，現在由巴黎二十個市區（註一）的市長管理。四月三十日取消了借貸處，這種借貸處是私人剝削勞動者的工具，是違反工人對於勞動工具對於取得信用的權利的。五月五日決定拆毀爲被殺的路易十六（註二）贖罪而建立的小教堂。

這樣從三月十八日起，巴黎運動的純粹的階級性質便尖銳地表現出來了，這種性質，一直到現在是被對於外敵的鬥爭所穩蓋着的。公社的成分，差不多都是工人與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所以它的決議，也都分明地表示出堅決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公社或是頒佈了共和主義資產階級僅僅由於懦弱而不敢實行的，但對於工人階級的自由活動却是基本條件的那些改革（例如對於國家，宗教只是私事的原則的實現）或是頒佈了直接關

（註一）爲市政管理之便，巴黎分爲若干市區，各市區有一市區長，爲該區之首領。

——編輯部註

（註二）路易十六在第一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被處死刑（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編輯部註

係工人階級利益的且並在相當程度內深刻刺入現社會制度的那些決定。但在被圍的城市中，這些決定只能做到第一步，從五月初起，公社就已經用所有一切力量去和數量上日益增加的凡爾賽政府的軍隊進行鬥爭。

四月七日，凡爾賽人奪取了巴黎西部戰線上賽拉河旁納依（*Neully*）渡口，但四月十一日他們向南線進攻時，就被愛特（*Endes*）將軍打敗了，而且使他們受到極大損失，那些如像聖者一般咀咒普魯士人砲擊巴黎的人，現在他們自己也不斷地砲擊巴黎了。這些人，現在要求普魯士政府快些歸還在西丹與美次所俘的法蘭西兵士，以便他們可以因其幫助來奪取巴黎，這些軍隊的逐漸歸還，使凡爾賽人自五月初起佔了決定的優勢。這在四月二十三日已可清楚看到了，當時梯亥爾已經停止和公社所進行的談判（這一談判原來公因社建議而開始的，其目的是把在巴黎拘押的巴黎主教與其他很多教士去和二次當選為公社委員當時還被監禁在克里爾華 *Clairvaux* 的勃朗基 *Blanqui* 對換），這在梯亥爾演說口氣的改變中，更明白的表現出來：向來講話很謹慎，很含糊的他，現

在忽然變成大胆的，粗暴的與威嚇的了。五月三日凡爾賽人佔據了南部陣線的茅林薩葵（Moulin Saquet）的高墩，九日佔據了被大砲轟毀了的依西（Issy）砲台，十四日佔據了萬維斯（Vanves）。在西部戰線上，他們在佔據了很多鄉村與建築物並延伸到了城牆脚下之後，就漸漸進攻到最主要的防線了。五月二十一日由於叛變，由於那裏國民軍的不謹慎的結果，他們闖進了城市。佔據北部與東部砲台的普魯士人讓凡爾賽人通過那些依照和議條件他們所不能通過的區域去攻擊城的北部，以致他們能從防備較弱的很長戰線上（在那裏，根據議和條件，巴黎人認為是能夠保證不受侵犯的）實行進攻。這就說明，爲什麼在巴黎西部以及在城市的富有區域，抵抗是比較的薄弱。這種抵抗，當敵軍愈是接近京城東半部，愈是接近工人區時，就愈是變成有力與頑強了。只在經過十八天的鬥爭之後，公社的最後擁護者才在貝爾維爾（Belleville）及米尼爾蒙當（Menilmontant）的高處倒地了，那時赤手空拳的男子、婦人與小孩之橫遭慘殺達到了極高度。這種殘殺，以更大的殘酷來進行，並且延長了整個的星期。用新式槍械來殺人還不夠快，結果更用溜彈砲

去整千整萬地屠殺被征服者。貝爾拉希斯 (Perelachaise) 坟地上的公社社員的城牆，至今還屹然長存，在那裏會施行了最後的大批的殘殺，這一城牆是啞口的同時又是很多表示的證人，說明當無產階級敢於出來保護自己權利之時，統治階級是會進行如何瘋狂的屠殺，於是開始了大批的逮捕。因為不能將所有被捕者完全殺掉，所以從其中任意抽出好些犧牲者拿來槍斃，其餘的則關在一個大營房中，等待軍事法庭的審判。從東北圍困巴黎的普魯士軍隊，得到了不准放鬆一個逃亡者的命令，但當兵士們服從他們的人道的感覺較甚於服從他們的長官之時，他們也只能裝做不知而已。特別表示出自己人道行為的，是薩克遜軍團，他曾經放走了很多分明的公社的擁護者。

如若現在，在二十年之後，回顧一下巴黎公社的活動與歷史意義，那我們就可看到內戰的敘述，還需要有相當的補充。

公社社員共分兩部：大多數為勃朗基主義者，在國民軍中央委員會中間佔統治地位；少數為國際工人聯合會會員，可是主要是蒲魯東的信從者。那時，勃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是

社會主義者，大部分只是根據他們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本能，其中只有很少幾個，靠着那位知道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凡蘭（Vaillant）的幫助，才得到對於基本原則的比較明白的了解。這就說明爲什麼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我們現在看來所必須要做的工作。尤其使我們不能了解的，是公社對於法蘭西銀行的寬大態度，這也是非常重大的政治的錯誤。把銀行拿到公社手中，這比一萬個抵押者都還有更大的意義，這將會使法國的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用壓力要它來同公社議和吧。但是，尤其令人注意的，就是雖然公社是由勃朗基主義者與蒲魯東主義者組成，但它的行動却常常是完全正確的。很明顯的，對於公社的經濟方面的訓令，不論是其優點或是缺點，負責的人，首先是蒲魯東主義者。對於政治的行動與缺陷，負責的人，是勃朗基主義者。像經常所發生的，當政權落到信條主義者手內時，他們的某些行動却正會同他們學派的信條上所寫的完全相反，這真是歷史的諷刺。

蒲魯東——這個小農與小手工業者的社會主義者，對於組合是痛恨的。他說，組合的中間，不好的地方超過好的地方，組合在其本質上是沒有效果的，它甚至是有害的，因爲它

是束縛工人自由的鎖鍊，是空洞的信條，是無用的繁重的，不但違反工人的自由，而且也是違反節省勞動的原則的；它的缺點比較它的優點發展得快；同組合相反，競爭、分工、私有財產却是經濟的力量。組合只有在大工業與企業中，如像鐵路中，才可以應用；但這樣的蒲魯東的意見，不過是特殊的場合而已。（參看他的著作革命的一般見解 *Idees generales de la Revolution* 第三版）

在一八七一年，就是在奢侈品手工業生產中心的巴黎，大工業也已經不是稀有的現象了。公社最重要的命令即要求把這種大工業以至把手工業組織起來，這種組織不但依據於每一工廠的工人組合，並且還依據於聯合所有這些聯合為一個大聯合。

這樣的組織，像馬克思在內戰中所正確地說明的，必然會達到共產主義，達到與蒲魯東主義直接相反的一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公社是蒲魯東的社會主義學派的坟墓。這學派，現在在法蘭西工人中間已經消失了；不論在『可能派』（*Possibilistes*）中間，或是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註）都統治着馬克思的學說。蒲魯東主義者只有在『急進的』有

產者中間還可以遇到。

勃朗基主義者的遭遇，也並不比較好些。向來就受教於陰謀派學校，慣於服從陰謀的嚴厲紀律的他們，以為用比較少數的勇敢的，很有組織的人，在某種順利的條件之下，就不僅可以奪得政權，並且用極大的努力來幹，還能夠保持政權，直至把民衆吸引到革命方面來，把他們環繞於少數領袖的四周為止。爲了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把全部政權掌握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成爲最嚴格的專政的集中。勃朗基主義者佔據大多數的公社，做了些什麼呢？它對法蘭西各省發表了宣言，其中號召人民，將一切公社同巴黎聯合爲一個自由的聯

（註）法國工黨在一八八二年愛田（Etienne）大會時分裂爲兩派，一派擁護蓋德（Guesde）（馬克思主義能派，是出自「可能」這個名詞，即是指順應「可能性」的人們），一派擁護勃洛塞（Brousse）（可能派）者。機會主義派——可能派或勃洛塞派——爲獵取選舉的勝利而否認黨綱，他們的煽動只限於「可能實現」的要求；他們進行反對黨的紀律之鬥爭，要求地方黨部對於選舉綱領底問題，對於與其他政黨聯合的策略都有自主權。



邦，爲一個真正的國民第一次自己造成的國家組織。常備軍、政治警察、官僚，一切這些爲一八七九年拿破倫所造成的舊的集中政府的壓迫權力，從那時以來，都爲每一新政府用來反對它的敵人的便利的工具，——這種權力，應該到處被消滅，如像它在巴黎被消滅一樣。

公社不得不從最初就承認，獲得政權的工人階級，不能利用舊的國家機關來進行統治；如若工人階級不願意失去它剛才獲得的政權時，則它應該一方面取消全部舊的，直到現在用來反對它自己的那種壓迫機器；第二，保證它自己不受它自己僱員與全權代表的危險，宣佈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調動與撤換。

一直到現在，國家的特徵在那裏呢？最初社會用簡單的分工的辦法，替自己建立特殊的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利益，經過了相當的時期，這些爲他們特殊利益服務的機關（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政權）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社會的主人了。這不但在世襲的君主政體內，即在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如此的。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美國那樣，『政治家』成爲國

家的如此特出，如此有力的部分，那裏兩大政黨（註）互相更迭的佔着統治的交椅，這種政黨裏面的管理者，又是那些把政治當作謀利事業的人，他們拿合衆國國會或是各州州議會的議席當做投機事業，或是以替本黨煽動爲生活，在本黨勝利之後則得到相當職位的報酬。大家都知道，在最近三十年來，美國人爲了推翻這種不能令人忍耐的桎梏，不知道花了多少氣力，然而，他們都還是一天一天跑到賣官鬻爵的泥坑中去。正是美國可以最明顯的看出，這國家政權如何從社會的工具變成了特出於社會的機關。那裏沒有皇朝，沒有貴族，沒有常備軍（除了幾個監視印第安人的兵士之外），沒有那種擁有經常位置與領取養老金權利的官僚。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兩派政治的投機家，如何輪換地佔據政權，用最骯髒的方法，爲最卑鄙的目的來運用這一政權——而全國國民，則無力起來反對這兩大政客的聯合，這些人表面上是給國民服務，實際上却是剝削他們與統治他們的。

（註一）共和黨與民主黨。在早先時期，民主黨是代表地主的南部底利益，共和黨是代表工業的北部底利益。現在，這兩黨都是金融資本底代表。

爲了反對這種國家機關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爲社會的主人（這種轉變，在一切直到現在所有的國家中必然要發生），公社採取了兩個不錯的辦法：第一，一切職務，行政官、法官、教員，都任命總選舉所選的人去担負，同時確定了根據選舉人決議隨時可以撤換被選舉人的權利；第二，一切公社的辦事人，不論是上層的與下層的，都只得到其他工人所得到的薪額。公社一般所付的最高薪俸，只有六千法郎。這樣，就是沒有公社給與代表機關的代表之確定證書（公社是格外的引用了這種證書的），公社也已向爭權奪位鑽營私利的行爲築下了有效的障礙物了。

在內戰第三章，很詳細的敘述了這種舊的國家政權的摧毀與新的、真正民主的政權代之而興。我們以爲在這裏有簡略的挑出這種過程的幾個要點來說一下的必要，因爲在德國，對於國家的迷信的崇拜，已經從哲學轉爲資產階級的甚至許多工人的共同意識了。根據德國哲學的學說，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翻譯爲哲學語句的話，是『上帝在地上的統治』。在這領域上似乎實現着或是應該實現出永久的真理與正義。從這上面，就產

生對於國家，與對於一切有關國家的事物之迷信的尊敬。而且因爲人們從出世以後，即習慣於那種思想，以爲全社會的共同的事業與利益，如不用以前的方法，即不經過國家與其高俸厚祿的官吏之助，就不能實現與遵守，正由於如此，所以對於國家的尊敬，就更容易深入腦中了。

人們設想着，如果他們脫離對於世襲君主政權的信仰而開始成爲民主共和國的擁護者時，他們將是實行非常勇敢的行動。實際上國家不過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這在民主共和國，並不比較君主國爲差。國家最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中，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所承受到的不良之物罷了，勝利的無產階級，根據巴黎公社的前例，必須要盡可能迅速地消滅這不良之物的最壞方面，直至在新的自由的社會制度中成長起來的後代，最沒有力量把這國家機關的垃圾拋棄的時候。

近來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庸人（註）又開始在『無產階級專政』幾個字的前面體驗到最大的恐怖了。親愛的先生們，你們願意知道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

是無產階級的專政。

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紀念，作於倫敦。

(註)在一九三二年以前所出版的各種版本中，原文都有「德國的庸人」這幾個字。這是偽造的。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所保有的恩格斯的原稿，所寫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俗人」，「社會民主主義的」這幾個字後來被劃去，而把「德國的」這幾個字加進去，塗改的筆跡不是恩格斯的，而是不知何人的筆跡。

——編輯部註

#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爲普法戰爭告歐美各分會全體

## 會員第一書

在一八六四年十一月我們聯合會的成立宣言上，我們說過：『如若工人階級的解放，要求有工人的兄弟團結及共同合作，那末當對外政策追求着犯罪的目的，玩弄着民族的成見，並且在掠奪的戰爭中摧殘民衆的鮮血與財產之時，工人階級如何能完成這偉大的使命呢？』我們當時用下列幾句話說出國際所要達到的對外政策：『私人在相互關係上所應遵守的簡單的道德與正義的法則，應成爲各國相互關係上的支配規律。』

那個利用法蘭西內部階級鬥爭而篡得自己政權，並利用許多對外戰爭來延長自己政權的拿破倫第三，一開始就把國際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看待，這實是不足爲怪的。在國

民投票（註一）的前夜，他在巴黎、里昂、路安、馬賽、勃雷斯脫，總之在全法國，都向國際工人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舉行進攻。（註二）說因為國際是一個秘密的團體，並且說，它準備着一種以殺死他為目的之陰謀。這種虛構之無稽，不久就被他自己的法官所指破了。究竟國際的法國支部的真正罪惡在那裏？它的罪惡就是在它公開的向法蘭西民衆說：『國民投票』就是等於贊成國內的專制與對外的戰爭。事實上，他們的工作，就是在於使得法國的工人階級，如像一個人一樣，在法國一切大都市與一切工業中心起來反對國民投票。不幸，因為鄉村區域的深刻的無知，工人階級的呼聲是被壓倒下去了。交易所、列強的內閣、統治階級以及差不多一切歐洲的報紙，都慶祝國民投票的勝利，以為這是法蘭西皇帝

（註一）拿破倫第三為要鞏固他的帝國並破壞共和主義在國內的煽動，就安排舉行『國民投票』。在一八七〇年五月八日，全國要對政府底某些自由主義的改良與憲法的修改表示態度。贊成新憲法，因而贊成帝國的有七、三五、八、七八六票，反對的有一、五七、一、九三九票，棄權的有一、八九、四、六八一人。——編輯部註

（註二）這是指在帝制之下對國際工人聯合會的第三次的法庭起訴。

——編輯部註

對於法蘭西工人階級的絕大的勝利；可是實際上，國民投票不是絞殺某一個人，而是絞殺全體國民的信號。

一八七〇年七月的軍事冒險，（註三）只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國家政變的修正版，初看起來，事情是如此的荒謬，以至使法國不願意相信關於戰爭的謠傳之嚴重性。大家却更相信那些認爲總長的挑戰的演說實不過是交易所把戲的議員們。最後，當七月十五日，關於戰爭的事情，已正式向立法團聲明時，全部反對派都拒絕批准初步的用費；梯亥爾自己還咀咒戰爭，以爲這是『下流的』事。一切獨立的巴黎的報紙都斥責這戰爭，而且很離奇的，即各省的報紙也差不多完全是同它們同意的。

同時國際在巴黎的會員重新開始工作了。在里衣爾（Revel）上，他們於七月十二日公佈了給全世界工人的宣言，其中說：

『政治的自大，在保護民族尊嚴與歐洲均勢的藉口之下又威脅到整個的和平了。德

（註三）德法戰爭開始於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



意志的與西班牙的工人們！聯合你們的呼聲爲一個總的反對戰爭的怒吼吧。爲着霸權問題而起的戰爭，或者，爲着某一皇朝的利益而發生的戰爭，在工人們眼中，不是別的，只是犯罪的愚蠢而已。我們需要和平工作與自由的我們，大聲的抗議那些能在血的賦稅（指兵役）中贖出自己的人們之挑戰喊聲，那些以社會的不幸爲新的投機事業源泉的人們之挑戰喊聲！我們的德意志的弟兄們！我們中間，法蘭西工人與德意志工人中間互相仇恨，其唯一結果，只能使萊茵河兩岸的專制政權完全勝利；全世界的工人們！不論在當前這一時期內我們共同努力的結果如何，我們，國際工人聯合會的會員（對於他們，任何國家的界限是沒有的），我們從法國工人方面向你們致誠懇的願望與敬禮，以作不可分離的團結的保證。」

在我們巴黎支部的宣言之後，接着，發現很多的法蘭西的宣言。我們現在只能引用其中之二。這乃是屬於賽納河畔納衣支部的宣言，公佈於七月二十二日馬賽報上。其中說：「這一戰爭是公平的嗎？不！這是民族的戰爭嗎？不！這完全是皇朝的戰爭。爲了正義，爲了民主，

爲了法蘭西的真正利益，我們完全，而且用盡全力贊助國際對於戰爭的抗議。」

這些抗議表示出法蘭西工人的真正感覺，這不久在一次有趣的事件內，就明顯地表現出來了。當「十二月十日社」（這社是在拿破倫第三就總統職時組織的）的一夥改穿了工人的藍衫，跑到街道上，想利用紅人的戰爭的跳舞煽起戰爭的熱狂之時——市郊的真正工人却以盛大的擁護和平的示威來回答他們，以致使警長彼德立不得不認爲必須立即禁止以後街道上的任何示威遊行，其藉口是：盡忠的法蘭西人民，已經足夠地表現了他們的久已懷抱了的愛國主義，並且已經爲他們自己無窮盡的熱情找得了出路。

不論拿破倫第三同普魯士的戰爭如何結束，第二帝國的喪鐘是已經在巴黎鳴着了，第二帝國的終結，已像它的開始一樣：是可憐的模仿的滑稽劇。但是不應忘記，正是歐洲的許多政府與統治階級使拿破倫第三能在十八年內有扮演帝國復辟的殘酷的滑稽劇之可能。

對於德意志方面，這戰爭是防禦的戰爭（註一）但是誰使德國陷入於必須防禦的狀況

況中去的呢？誰使拿破倫第三有向德意志進行戰爭的可能呢？普魯士同拿破倫第三玩弄陰謀的，不是別人！正是俾斯麥，他想以此來鎮壓普魯士內部的民主的反對派，使德意志牢固的固定在亨佐親皇朝的手裏。如若薩多渥（Sadowo）一役，（註二）沒有獲勝而遭受

（註一）在德國這方面，戰爭是自衛戰爭。因為拿破倫主義的法國，是要使德國分裂，阻止德國的統一。民族的統一問題曾是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底一個基本問題。所以德國反抗拿破倫的法國而從事戰爭，是自衛的性質。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方面說戰爭在德國方面是自衛的性質，同時要求德國工人政黨應該：（一）把德國民族的利益與普魯士王朝的利益很明確地分開來；（二）反對阿爾薩斯、勞倫之吞併；（三）巴黎一被共和主義的非民族侵略主義的政府握到政權，便立即應當講和；（四）不停地鄭重主張德國與法國的工人團結起來（他們都不贊成戰爭，他們相互間也沒有什麼爭端）。

——編輯部註

（註二）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薩多渥（Sadowo，在波希米亞）之役，在普奧戰爭中起了決定的作用。普魯士戰勝了奧地利之後，奧地利就被排出於德意志聯邦之外，俾斯麥底德國統一計劃底主要部分就告完成了。（北德聯邦的建立）

——編輯部註

失敗，那末法國的軍隊，將會以普魯士同盟者的資格滿佈於德意志。難道普魯士在得勝之後，曾有一分鐘想到將自由的德意志去和被奴役的法蘭西相對抗嗎？恰正相反！它拚命保持了自已舊制度的一切陳腐的妙處，並且爲補充起見還向第二帝國學來它的一切鬼計，如像它的實際的專制與假裝的民主，它的政治上的欺詐與財政上的竊盜，它的漂亮的言論與最下流的行爲。在此以前，只在萊茵河左岸繁榮着的拿破倫主義的統治，此時，在萊茵河右岸也找到它的配偶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戰爭，還能等待到什麼呢？

如若德國的工人階級，容許這一戰爭失去其純粹防禦的性質，而蛻化爲反對法蘭西民衆的戰爭，那不論是勝利，不論是失敗，都同樣是毀滅之路。德國在所謂解放戰爭之後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將更殘酷的重新加到它的身上。

可是國際的原則，在德意志工人階級中間已是如此的廣佈，如此的深入，使我們不必恐懼如此悲慘的結果。法國工人們的呼聲，已在德意志找到了它的回響。七月十六日在勃朗希唯格（Brunswick）召集的盛大工人大會宣稱它完全同意於巴黎的宣言，很堅決

地拒絕任何對法蘭西表示民族仇恨的思想，並且在通過的決議中說：『我們是一切戰爭，首先是皇朝戰爭（註）的敵人；我們帶着深刻的悲哀與痛苦，看到自己不能不參加這個防禦的戰爭，如像參加不可避免的惡事一樣；但我們同樣號召德國的整個工人階級要努力使如此可怕的社會的不幸不能再不能重複，同時為民衆取得自己解決那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權力，這樣使民衆成爲它自己命運的主人翁。』

在五萬薩克遜工人的全權代表的開姆尼茨（Chemnitz）大會上，一致通過了如下的決議：『以一般的德國民主主義者的名義，特別是以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的名義，我們宣佈，現在的戰爭，完全是皇朝戰爭……我們很快樂的握住法國工人們伸給我們的兄弟的手……記住國際工人聯合會的口號：『一切國家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呵！』我們永不會忘記全世界的工人是我們的朋友，全世界的專制魔王是我們的敵人。』

（註）在法國這一方面，普法戰爭是王朝的戰爭，拿破倫第三希望用對外作戰勝利去挽救拿破倫帝國的崩潰。

的崩潰。

國際的柏林支部，同樣的回答巴黎的宣言道：『我們以十二分誠意擁護你們的抗議：我們敢立下偉大的誓言，任何軍號的響聲，任何大砲的轟擊，任何勝利，任何失敗，都不能使我們拋棄我們的共同事業——全世界工人聯合的事業。』

在這自相殘殺的鬥爭的幕後，呈現出俄羅斯的兇相。正當俄國政府完成了對於它的重要戰略意義的鐵路並向普魯脫方向集中了軍隊之時，發出當前戰爭的信號——這是很壞的徵兆。雖然德國人在反對拿破倫進攻的防禦戰爭中有全權獲得同情，但是只要他們容許普魯士政府請求哥薩克的幫助或只是接受這種幫助，那末他們便立刻要失去這種同情。讓他們好好記着德意志在它反對拿破倫第一的獨立戰爭之後幾十年內都是無助地匍匐於沙皇腳下的這件事吧。（註）

（註）德國與沙皇的俄國聯盟，而向拿破倫第一作戰。在打敗了拿破倫第一之後（一八一四至一五年）創立了『神聖同盟』。由於『神聖同盟』，俄國在國際政治上獲得巨大的影響，而開始扮演『歐洲的憲兵』底角色。普魯士呢，如馬克思所說，變成爲『歐洲諸國馬車之第五個車輪』（馬車只有四個車輪，第五個車輪

就是無用的東西——譯者。

——編輯部註

英國工人階級，兄弟般地將他們的手伸給法國的工人，正如他們伸給德國的工人一樣。他們相信，不論現在的可怕的戰爭如何終結，全世界工人的聯合，最後是要根絕一切戰爭的。在官場的法蘭西與官場的德意志進行自相殘殺的搏鬥時，工人們却相互致送和平與友愛的盛詞。只是這一件在歷史上無與倫比的事實已經展開着對於更光明的將來之希望。這事實指示出，與經濟貧窮、政治荒謬的舊社會相反的新社會，是在誕生着了，這新社會的國際原則就是和平，因為在一切民族中，將只有一個同樣的統治原則——即勞動。

這新社會的預告者，是國際工人聯合會。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倫敦。

##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爲普法戰爭告歐美各分會全體

### 會員第二書

在我們七月二十三日的第一宣言中，我們說過：『第二帝國的喪鐘是已經在巴黎鳴着了。第二帝國的終結，正像它的開始一樣，是可憐的模仿的滑稽劇。但是不應忘記，正是歐洲的許多政府與統治階級使拿破倫第三能在十八年內有扮演帝國復辟的殘酷滑稽劇之可能。』

這樣，在軍事行動開始以前，我們已把拿破倫主義的肥皂泡看作是過去之事了。

我們對於第二帝國的生活能力的問題，是沒有陷入迷陣的。我們對於在德意志方面『戰爭會失去它的純粹防禦的性質而蜕化爲反對法蘭西民衆的戰爭』的危懼，也是沒



有錯誤的。在拿破倫第三出降，西丹投誠，並在巴黎宣佈共和國的時候，（註）防禦的戰爭真的是已經終結了。但遠在這些事件以前，當拿破倫第三的軍國主義的完全腐敗已經顯露出來時，普魯士軍事當局已決定把戰爭變為掠奪的戰爭了。固然，威廉王自己在戰爭開始時的宣言，對於這些老爺們是不爽快的障礙物。在他對北德意志國會所作的即位演說中，威廉莊嚴地說，他之進行戰爭只是反對法國的皇帝，而不是反對法國的民衆。八月十一日，他對法國國民發表了宣言，其中說：『法王拿破倫在海上與陸上都向德意志國家進攻，而德意志國家在從前和現在都是願意同法蘭西人民和平共居的，我擔負起指揮德國軍隊的職責，爲的抵禦他的進攻，而戰事的過程却使我超越了法國疆界。』在威廉聲明了他擔負起指揮德國軍隊的職責『爲的是抵禦進攻』之後，他自己還不满意，他爲着更加證實『戰爭的純粹防禦性質』起見，更增加着說，只是因爲『戰事的過程』使他『超越了法

立了。

（註）九月二日色當之役，法軍大敗，法國皇帝被俘。九月四日，法國宣佈共和，而所謂『國防政府』就成

國的疆界。』防禦的戰爭，當然是並不排除『軍事的過程』所決定的進攻行動的。

這位『仁慈』的皇帝就這樣莊嚴地在法蘭西與全世界的前面允許舉行純粹防禦的戰爭。如何使他能從這種莊嚴的允許中解放出來呢？這幕滑稽劇的導演者必須設法把事情描寫成那樣。似乎威廉之睽離德意志人民的堅持要求，是出於不得已的。爲了這個目的，他們立刻將暗號給予德國自由資產階級；其中包括教授與資本家、議員與新聞記者。這一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六年——一八七一年爲公民自由而鬥爭的時候，表示出空前的懦怯，不堅決與無能力，現在看到要在歐洲舞台上演出德意志愛國主義的台柱的角色，當然感動的了不得。它（指普魯士自由資產階級——譯者）戴着公民獨立的假面具，爲的是裝出似乎它強迫着普魯士政府：去實行這一政府自身的秘密計劃。它埋怨自己爲何長久地、差不多是宗教般地信仰拿破倫第三之神聖不可侵犯，所以大聲地要求法蘭西共和國的分裂。我們現在拿一分鐘時間來研究一下這些『愛國主義』武士們所散播的華麗的見解吧。

他們不敢斷定亞爾薩斯與勞倫的人民是渴望着德意志的懷抱。却正相反，爲着要懲罰史德拉斯堡對於法蘭西的愛國心，『德意志的』開花彈曾經徒然地，野蠻地（因爲在軍事上說重要的不是城市而是獨立分佈的堡壘）向該城轟擊了六天，打死了很多赤手空拳的居民。還說這些省份的土地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屬於德意志帝國的！如若拿這理由做根據，那末難道不要把這地方的全部土地及人民充公作爲德意志的自古已有的私有財產嗎？你們知道，如若依照古代歷史愛好者的稱心的意思來恢復歐洲的舊日版圖，那無論如何不能忘記，從前勃蘭德堡侯爺曾經以普魯士王侯的資格充當過波蘭共和國的屬下。

但是巧妙的愛國之士，要求把亞爾薩斯與勞倫的德人部分作爲反對法國進攻的『物質的保障』。因爲這種可鄙的藉口，在許多思想薄弱者的頭腦中種下了紛亂，所以我們以爲比較詳細地來研究這一點，實是我們的責任。

無疑的，亞爾薩斯與萊茵河對岸的一般地形，以及差不多正在巴塞爾與蓋爾曼依

斯姆半途上的史德拉斯堡那樣大的砲台的存在很容易使法蘭西侵入南德意志，而南德意志却因為這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却很難侵入法蘭西。更無疑地，亞爾薩斯與說德語的勞倫之歸併於德國，會強大地鞏固南德意志的邊界，那時，它將能夠控制華格斯山整個山脈，佔取屏障北方出口的砲台。如若美次再被併入，那法國立刻就會失去反對德國的兩大軍事據點，雖然這還並不能阻止它再在內西（Narsy）與凡爾登建設新的砲台。德國有高伯萊茨（Koblenz）、曼茨（Mainz）、格梅斯海姆（Celmersheim）、拉斯塔特（Rastatt）與烏爾姆（Ulm），這些都是專用來反對法蘭西的軍事據點。德國在最近一次戰爭內，很好的利用了他們。那它還有絲毫什麼權利嫉妬在這一區域只有兩個重要砲台，（美茨與史德拉斯堡）的法國呢？

此外，只有在南德意志與北德意志分散的時候，史德拉斯堡才能危害於南德意志，從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五年，南德意志從沒有一次因為普魯士曾參加了反對法蘭西革命的戰爭而從這方面受到攻擊。但當普魯士於一七九五年訂立了單獨的和約不再顧及南

德意志的時候，對於南德意志的攻擊就開始了，並且一直繼續到一八〇九年，當時史德拉斯堡變成了軍事據點。實際上，如若德國集中它的一切軍隊於沙爾魯依（Saarlouis）與蘭稻（Landau）之間（如像在這一次戰爭中所做的那樣），並將他們推向前面或是在馬茵茨與美次的路上作戰，那末統一的德意志儘可以不受史德拉斯堡及亞爾薩斯任何法國軍隊的威脅，只要德國的軍隊在那裏駐紮着，那一切從史德拉斯堡進攻南德意志的軍隊，都有同根據地隔絕的危險。如果最近的軍事行動有所證明的話，那末所證明的只是從德國容易向法國進攻的這一點罷了。

但，老實說吧，把軍事的觀點變成決定國界的原則，難道不是盲目與時代錯誤嗎？如果依照這樣的規律，那奧大利就還可以有權要求威尼斯與尼亞西亞，而法蘭西爲着保護巴黎就可以要求萊茵河一帶，因爲巴黎可能從東北受到進攻的危險，比較柏林可能從西南受到進攻的危險重大的多。如若國界是按軍事的利益來決定的話，那這種要求便沒有終結，因爲一切軍事的畛域，都有它們的缺點，而這種缺點只有併吞新的區域才能得到改良。此

外，這些界限，決不能被最後的而且公平的劃定，因為每一次劃界時，總是勝利者向着失敗者提出所決定的條件，而這裏已又種下了新戰爭的種子。

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情形，正像在人與人之間一樣——這是一切歷史教導我們的。爲得要使他們沒有進攻的可能，就必須奪取一切他們所有的防禦工具。不但要捉住他們的喉頭，而且要弄死他們。如若說，在某一時候，某一個勝利者曾經得到過一種破壞對方民族力量的『物質保障』的話，那這就是拿破倫第一在推爾西德條約中（註）在他對普魯士與其他德意志國家實行這條約時所做的事。可是幾年之後，一切這些偉大的力量在德意志前面如像烟一樣的消散了。可是德意志在它野蠻的夢想中所希望從法蘭西得到的『物質的保障』同拿破倫第一從德國所得到的比較一下，表示出什麼呢？這一次的結果將是同樣的毀滅之路。歷史的報應不是依照從法蘭西所得土地的平方英里來計算的，而是

（註）依照着一八〇七年的推爾西德條約法國強迫普魯士縮減陸軍，償付一萬萬塔爾（Talers——德

國銀幣）賠款，並割讓東部與西部的領土。

——編輯部註

依照犯罪（就是十九世紀後半期所重新興起的掠奪政策）的大小來決定的。

德意志愛國主義的擁護者對我們說：但是你們不應該把德意志人同法蘭西人混淆起來；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光榮，而只是安全；德意志人——實際上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在他們沉靜的注視中間，他們甚至把侵略從將來戰爭的原因變為永久和平的保證了。自然在一七九二年將自己軍隊驅入法國，想藉槍刺之助去達到壓倒十八世紀革命之目的，並非德意志！而污着手去奴役意大利，鎮壓匈牙利與瓜分波蘭的，也並非德意志！他的現有的軍隊制度，把一切壯年男子分成兩部分，（常備軍與後備軍），而且任何部分都須絕對服從他們的長官，——這制度自然是全體和平的『物質的保障』，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在德國，如像別處一樣，政府的走卒總是用虛偽的吹噓來強奸社會的輿論。法國的砲台，美次與史德拉斯堡，很使德國的愛國主義者憤激，但是他們在俄國的巨大的要塞網（革沙馬特林、伊凡城）中，却不見有什麼不公平，在拿破倫進攻危險之前戰慄着的他們，對於沙皇壓迫的全部恥辱閉目不視。

正像在一八六五年俾斯麥同拿破倫第三交相允諾一樣，在一八七〇年同樣情形發生於俾斯麥與高察可夫之間。（註一）正像拿破倫第三渴望着，一八六六年的戰爭在其耗竭雙方（奧地利亞與普魯士）力量後，將會變成德意志運命的支配者一樣，亞歷山大也渴望一八〇年的戰爭在耗竭德法力量之後將有變成整個西歐運命的支配者之可能。正像第二帝國認爲自己不可能同北德意志同盟同時存在一樣，沙皇俄羅斯也應該感覺到以普魯士爲首的德意志帝國方面所給的危險。這是舊日政治制度的規律。在這制度中間，一國之勝即別國之負。沙皇對於歐洲的重大的影響，是基於他對德國的傳統的優勢。當在俄國本身火山似地社會力量動搖着沙皇制度的根基時，沙皇能容許他的外部力量的衰落嗎？莫斯科的報紙已經用一八六六年戰爭後拿破倫的報紙所用的口氣說話了。（註二）

（註一）在一八六五年拿破倫第三答應俾斯麥，在普奧發生戰爭時，法國保守中立。在一八七〇年，俄國外交部長高察可夫（Gorchakov）答應在普法戰爭中俄國保守中立。

（註二）俄國的報紙攻擊俄國政府對於普魯士的友誼的態度。

——編輯部註  
——編輯部註



難道德國的愛國主義者竟以為強迫法蘭西投到俄國的懷抱中去可以保證德意志的自由與和平嗎？如若軍事上的僥倖，對於自己勝利的驕傲以及皇朝的陰謀，推動德意志走上用掠奪去佔據法蘭西區域的道路的話，那末，在它的前面只有兩條路：或者它應該用盡一切方法成爲俄國掠奪政策的分明的一個工具，或者它應該在短期的休息之後，開始準備『防禦』戰爭，不是那『地方的』戰爭，而是人種的戰爭，而是反對聯合的斯拉夫種與羅馬種的戰爭。

德國工人階級沒有阻止這一戰爭的可能，它把這一戰爭作爲爲着德國獨立爲着把德國與全歐洲從第二帝國的腐爛着的羈絆之下解放出來的那種戰爭，而用力地來擁護它。德意志的工業工人及鄉村工人組成了英勇的軍隊的骨幹，而他們家庭中的人丁，却處於半飢半餓的狀態之中，他們不僅過着國外戰場上的困苦，而且還有家庭貧困的極大痛苦在等候着他們。他們現在也要求『保證』保證他們的無數的犧牲不會付之流水，保證他們真正的得到自由，保證他們對於拿破倫軍隊的勝利不會像一八一五年那樣變成德

意志人民的失敗。他們要求『不喪失法蘭西名譽的和平』與『法蘭西共和國的承認』作為這種保證的第一點。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於十月五日發表了宣言（註）其中竭力要求這種保證。它說：『我們反對吞併亞爾薩斯與勞倫。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以德意志工人階級的名義說話的。爲了法德的共同利益，爲了和平與自由的利益，爲了西歐文明的利益，爲了向東方野蠻進行鬥爭的利益，德國的工人不能對於亞爾薩斯與勞倫的併吞默而不言……我們爲了共同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事業，將和我們的同志們，其他國家的工人們共同奮鬥到底！』

不幸，我們不能立即預計他們的成功。如果，法國的工人們在和平的時候，不能停止進攻的一方面，那德國的工人們，在軍事狂熱之際約束勝利者的機會，不是更少了嗎？德國工

（註）這個宣言，是以馬克思給德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的指示信爲基礎的（那封指示信發表於一八

七一年九月十一日的人民國家）

人的宣言，要求把拿破倫第三當作普通犯人交給法蘭西共和國手內。而他們的剝削者，却用盡力量設法再把他放到居萊爾的帝座上，把他當做最適合於使法蘭西陷於滅亡的人物。不論怎樣，歷史將證明，德意志的工人們不是像德意志的資產階級那樣是由那種惡劣的材料造成的。他們執行着自己的任務。

我們與他們一樣歡迎法蘭西共和國的建立，但是，同時我們擔憂着，我們希望這種擔憂能夠成爲沒有根據的。這個共和國並沒有推倒帝座，它只是佔據了後者所留下的空位。它的成立，不是被當作爲社會的獲得，而只是被當作爲國防的政策。它現在落到了那一部分爲奧利恩派及另一部分爲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所組成的臨時政府的手中；這種共和主義者的一部分，在一八四八年的六月暴動中間，是已經沾染了不能洗淨的污點的。這一政府內人員的分工，很難做出好的事業出來。奧利恩派佔了最有力量的地位——軍隊與警察，而所謂共和主義者却得到了空談的部門。這政府的最初幾個步驟已經很明顯的表示出它從第二帝國那裏不但承襲了廢墟的坟山，而且也承襲了對於工人階級的恐怖，如

果現在他們用共和國的名義很大量的允諾許多不可能的東西，那末他們這樣做不是爲得要引起有利於『可能的』政府之傾向嗎？這共和國，在資產者眼中看來（這些人是很願意做它的掘墓人的），不是到奧利恩復辟的過渡階段嗎？

這樣看來，法蘭西的工人階級，現在是處在最困難的情況之下。正在敵人敲着巴黎城門的時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是不智的絕望的蠢舉。（註一）法蘭西的工人們應該完成他們的公民的義務，但不應該爲一七九二年的民族的回憶，（註二）所誘惑，如像法蘭西的農民爲第一帝國的民族的回憶所欺騙一樣。（註三）（他們指工人們）所需要的不是重

（註一）關於這點，列寧在他的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文中寫道：

「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在巴黎公社發生六個月之前，馬克思鄭重地警告法國工人。他在著名的國際底宣言中，說推翻新政府的企圖，是絕望的蠢舉。他在事先就揭穿了要發動一個與一七九二年同一精神的運動底這種可能性，是民族主義的幻想……」

「但當羣衆已經起來時，馬克思就要和他們一同前進，要和他們一同在鬥爭過程中學習，而並不是向

他們作一番官僚主義的訓斥。他知道要想在事先就把機會估計得完全正確，這是吹牛或是絕望的迂腐。他以為工人階級英勇地、自我犧牲地拿起主動權製造歷史，其價值是超乎其他一切之上的。馬克思從那些製造歷史但不能在事先就把機會估計得毫厘不差的人們底立場來觀察世界歷史，而不是從一個用「這是很易預料的……他們原不應動用……」這樣的話去教訓人的知識分子的俗人底立場來觀察世界歷史。

「馬克思善於珍視這樣的事實，就是在歷史中會有這樣的時機，羣衆甚至爲了一個無成功希望的目標，而拚命奮鬥。但這爲了給這些羣衆更進一步的教育，爲了訓練他們準備下一次的鬥爭計，還是必要的。」

——編輯部註

（註二）馬克思是指一七九二年法國民衆在其對歐洲各國的反動聯合底進攻軍隊作戰之時的民族感情。他警告人們不要機械地把「祖國危急了」這個口號應用於普法戰爭中。「爲資產階級而對普魯士作戰，那是發狂。」（恩格斯）

——編輯部註

（註三）在選舉大總統時（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拿破倫第三利用了法國農民底成見，農民錯誤地把第一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底成就與拿破倫第一底名字聯繫在一起，他們爲了紀念拿破倫第一而投票選舉拿破倫第三。

——編輯部註

複過去，而且是建設將來。希望他們很鎮靜的，很堅決的利用共和國的自由所給與他們的一切方法來更切實地鞏固它本階級的組織。這將給予他們以強大的力量去爲法蘭西的新生與我們無產階級解放的共同事業而鬥爭。共和國的命運，就依靠在他們的力量與智慧之上。

在這一方面，英國的工人階級已經採取了某些步驟，他們想以外部的壓力破除他們政府對於承認法蘭西共和國的不願。（註一）英國的政府，現在想用遲延去抵銷一七九三年反甲可賓的戰爭（註二）以及那時承認拿破倫國家政變的匆促。此外，英國工人要求他們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去反對法蘭西的分裂，——一部分英國的報紙是無恥地要求這種分裂的。正是這部分報紙，在整個二十年內，尊崇拿破倫第三爲歐洲的救主，並且竭力贊揚美國奴隸主的暴動。（註三）現在它還是和那時一樣，盡力爲奴隸主謀利益。

國際工人聯合會的支部應號召一切國家的工人階級起來採取積極的行動！如若工人們忘記了自己的責任，如若他們的態度是消極的，那末，現在的可怕的戰爭將成爲新的

更可怕的國際戰爭的前驅，而且會在每一國家內使刺刀、資本與地主的武士們對於工人階級取得新的勝利。

共和國萬歲！(Vive la République)！

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倫敦。

(註一)馬克思是指在英國所開展的、主張承認法蘭西共和國底大的集會運動；這個運動是由馬克思與第一國際底總委員會主動的。

——編輯部註

(註二)是指歐洲列強第一次聯合(奧地利亞、普魯士、撒丁尼亞等國)反對第一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戰爭。在一七九三年二月英國與荷蘭加入戰爭，在三月西班牙也參加了。

——編輯部註

(註三)在一八一——一六五年美國內戰(工業的北部與擁護黑奴種植制度的南部之間的內戰)時，英國的資產階級贊助南部，即是贊助蓄奴制。這是由於這一事實，就是英國的資產階級看到工業的北部是自己的日益強大的競爭者，而南部則是英國市場的棉花的供給者。

——編輯部註

##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爲法蘭西內戰告歐美各分會全體會員書

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當巴黎的工人宣佈成立共和國而全國各處差不多立即齊聲一致地熱烈起來歡迎時，有一羣營鑽祿位的律師的徒黨，以梯亥爾（Thiers）爲其政治家，以脫羅秀（Trochu）爲其大將軍的，出來佔據了市政廳。這些人那時是如此迷信巴黎在一切歷史的變亂時期中所負的代表全法國的使命，使得他們以爲只要一拿出早已失效的巴黎代表的名義，就完全足夠使他們所偷盜得來的法蘭西統治者的稱號有了法律的根據。這是一些什麼人，我們在他們起事以後的第五天發給你們的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書內，已經向你們說過了。然而當巴黎突然被劫，工人階級的真實首領尚幽囚於拿破倫第



三的監獄中，普魯士人已在向巴黎進兵之時，巴黎容忍他們的僭位行動，完全是以他們利用這政權去保護祖國這一點為條件的。但是要能保護巴黎，就只有武裝工人，把他們組成爲真實的軍事力量，並且在本身戰爭中把軍事藝術教導給他們。可是武裝巴黎城，就等於武裝革命。巴黎戰勝普魯士的侵略者，就等於法國的工人戰勝法國的資本家及其政府的寄生蟲。在這個民族義務與階級利益的矛盾之間，那國防政府竟一刻也不動搖地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

他們的第一步驟，是派遣梯亥爾遊說全歐各國朝廷，請它們大發慈悲出來調解，並把共和國改成君主國爲交換條件。巴黎被圍四個月後，他們覺得開始說出投降二字的機會已經到了，於是脫羅秀在約爾，法佛勒（Jules Favre）及其他同僚數人同時在場的時候，向巴黎市政官的會議說出以下的話：——

『當九月四日之夕，同事們向我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巴黎能否勝利地抵住普魯士軍隊的圍困？那時我毫不遲疑的回答道：不能。現在到場的同事們中，總有幾個是能證

實我預料的正確和我主張的堅定的。當時我向他們說的，一字不改的就是下面這句話。依照現在的形勢，巴黎要想抵抗普魯士軍隊是一件蠢事——當然這是一件英雄的蠢事；但終究是蠢事呵……現在實際的經過（由他自己所佈置的）已經證明我的話並不會說錯。』脫羅秀的這一篇簡短而乖巧的演詞，是由當時到場的一個叫做哥滂（Gordon）的市政官事後發表出來的。

所以，即在共和國宣佈成立之夕，脫羅秀的同僚已經知道他的『計劃』是在於使巴黎投降敵人。如若國防二字不僅是梯亥爾、法佛勒等人的奪取統治地位的假面具，那末九月四日的興起者，就應當在九月五日放下他們的政權，將脫羅秀的『計劃』告訴巴黎的民衆，請他們趕快投降，或者讓他們自己起來掌握他們自己的運命。可是他們却不這樣做。這班無恥的騙子，決意用饑饉和死亡去治療巴黎的『英雄的蠢事』，而同時發表許多宣言去欺蒙巴黎人民。在這些宣言中，有一個說道：『脫羅秀，巴黎的總督，永遠不投降敵人。』

『外交總長——約爾·法佛勒是不肯割讓我們一寸的土地，也不肯犧牲我們堡壘上——

塊石頭的。』但是就是這個法佛勒，在他寫給甘貝塔（Cambetta）的信中，却發誓說，他們所抗拒的並不是普魯士的軍隊，而是巴黎的工人。在整個的被圍時期內，由詭黠的脫羅秀付託以指揮巴黎軍隊之責的那些拿破倫派的軍官，在其圍困期內的私人往來的信札中，却彼此競以輕薄的口氣嘲笑這雙方所共知的玩把戲似的國防。巴黎公社官報上所發表的一封信，即可作一例證。該信由巴黎國防軍砲兵總指揮兼有光榮隊大十字章的阿爾風斯·西蒙·居友（Alphonse Simon Guidod）發出寄給砲兵師長蘇珊（Suzanne）的。這種騙子的假面具，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到底揭下了。國防政府在投降中，竟以極端輕蔑的那種真正英雄氣概顯身露面，竟以俾斯麥的所俘虜組成的法國政府的資格顯身露面——這種卑賤的地位，就是拿破倫第三自己在色當時候，也是不敢承受的。三月十八日事變後，這些賣國賊倉皇的向凡爾賽奔逃，以至把那些證實他們賣國的文件都忘記帶走。事後公社在對各省的宣言中指出，爲着毀滅這些文件，『這些人是不恤將巴黎變爲一個沉沒於血海的邱墟的。』

事情之所以造成這樣一個結局，還是因為國防政府的幾個領袖人物有他們私人的非常奇特的原因。

議和之後不久，有一個巴黎的國民會議代表彌里晏（M. Milliere）君（他現在被法佛勒特別下令槍斃了），曾發表了許多證據確鑿的官場文件，證明法佛勒曾與一個伴居阿爾吉爾（Alger）的酒徒之妻相姦通，他多年籌劃，鑄造了許多最冒險的偽證，並以姦通所生之兒女的名義取得大宗遺產，使他變成了富人，後該酒徒之嫡嗣赴法庭控訴，他靠着拿破倫朝庭下面法庭的褊袒，始得免於敗露。因為這些鐵面無情的官場文件使他用多少巧辯都不能掩飾過去，所以約爾·法佛勒才生平第一次把他的嘴關閉起來，靜靜的等待着國內戰爭的爆發，好在那時候狂暴地跳起來宣告全巴黎的人民是一羣窮凶極惡的獄中逃犯，目無一切秩序、家庭、宗教和私有財產的暴徒。這個偽證鑄造者，在九月之後，一握得政權，便以同情之心釋放了劈克（Pic）和泰雷否（Tailleur）二人。這二個人，是尚在帝國時代因在愛登達（Erendard）報舞弊案中假造證書而被繫獄的，其中的一個泰雷否，

曾在公社時期大胆回至巴黎，公社立即把他送回監獄，然而約爾·法佛勒却在國民會議的演講台上大喊，巴黎人釋放一切獄中的囚犯！

愛倫斯·畢加德 (Ernest Picard) (這是國防政府的法爾斯達夫 (註) 他在帝國時代夢想做內務總長沒有成功之後，就自己指派他自己做了內務總長) 是一個叫做雅瑟·畢加德的人的兄弟，那個雅瑟·畢加德是因舞弊從巴黎交易所中被逐出來的 (看一八六七年七月十三日警察廳報告)，並據法庭審訊，他自己招出當他做法蘭西通用銀行的巴勒斯特羅街五號一個分行的經理時，他偷了行中的錢三十萬法郎 (看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警察廳報告)。這個雅瑟·畢加德却比被他的兄弟愛倫斯·畢加德指派做他的機關報 *La Electeur Libre* 的主筆。當股票交易所的經紀人們的事業因這個

內務部報紙的官場謊話而陷入混亂之時，雅瑟却正在內務部與總商會之間穿梭般串來

(註) 法爾斯達夫是莎士比亞戲曲中的角色之一——他是尖頭，大腹，說謊，胆小，貪食喜酒，愛揩別人的

油，作事未成即大吹大擂的典型的人。

串去，利用法國軍隊的失敗來謀利。這一對寶貝兄弟關於生意事情的全部通信，都落入了公社的手裏。

斐爾士·弗雷（Jules Ferry）在九月四日以前，原是個一錢莫名的窮律師，被圍時，他做巴黎市長，利用城中的飢荒括了不少的錢。如有一天他不得不作他的行政報告時，那他就會在這天被定罪。

像這些人呢，當然只能夠在巴黎的毀滅中得到他們的赦書（註一）俾斯麥所要的也正是這些人。然後經過了一番重新擺佈的手續以後，那一向躲在幕後推動政府的梯亥爾，忽然在政府的第一把交椅上現身出來了。那般得到赦書的人都做了他的總長。

梯亥爾，這矮子怪物，使法國資產階級醉心地崇拜他差不多半個世紀，正因為他是他們的階級腐敗的一個最完全的思想代表。在他成爲一個政治家之前，也是一個歷史家，那

（註一）在英國，囚犯在渡過大部分的刑期之後，有時得到一種證書，他們帶着這種證書，又在警察監視之下在外居住，這樣的證書叫做赦書，證書所有者，叫做得到赦權的人。

時他已經表現了他的說謊能力。他的政治生涯的記錄，就是法蘭西種種災難的歷史。一八三〇年之前，他與共和黨人混在一起，到路易斐力伯治下，他背棄了他的恩人拉斐德（Lafitte）而得到了總長的位置。爲要獻媚於國王，他鼓勵徒衆起來暴動攻擊僧侶，在這暴動中搶劫了聖·日爾曼·奧克賽洛伊（Saint Germain l'Auxerrois）教堂和大主教的宮庭，他並且與倍理侯爵夫人（de Berry）發生關係，爲她充當內閣偵探與監獄產婆。脫南斯諾南街之上屠殺共和黨人（註二）及九月間所頒佈的壓制報紙及集會結社權利的可惡的法律，也是他幹的事。一八四〇年三月，他已經是內閣總理了，那時他以他的鞏固巴黎防衛的計劃震驚了全法國的人民。當共和黨人反對這個計劃，認爲它是一個反對巴黎人民自由的罪惡陰謀時，他在人民代表會議的講台上答復道：

『什麼話！你們以爲任何防衛工作都會危害自由麼！說這種話，就是毀謗政府，是假想

（註二）一八三九年巴黎發生了共和民主黨人底起義，政府加以殘酷的鎮壓，沒有武裝的人民，連婦孺在內，也被屠殺。

世界上有一種政府爲着保持政權於自己手中會在某一天先來轟擊本國的京城……這種政府在戰勝之後比在戰勝之前更是一百倍的不可想了。』是的，除了那個預先將這些砲台獻給普魯士人的政府以外，確是沒有任何政府敢從那些砲台來轟炸巴黎的。

在一八四八年一月當砲彈國王（註）想要屈服巴勒摩（Palermo）時，久已不作總長的梯亥爾，在人民代表會議中起來發表這樣的話：『先生們，你們可知道，在巴勒摩發生了什麼事情麼？當你們聽見說，有一個大城市竟被繼續轟擊了四十八小時，你們大家都會驚駭得戰抖（在國會的意義下）被誰轟擊？是被那利用戰爭權利的外敵嗎？不是的，先生們，却是被它自己的政府爲什麼？因爲那個不幸的城市敢於要求它們的權利爲要求它的權利，却得到了四十八小時的轟擊……讓我來請求全歐洲輿論的公斷罷。我想，如果從這個全歐洲最大講台上，用憤激的話（真的，實在只是話）去斥責這種行爲，那這就是對於人

（註）拿布勒斯（Naples）王斐特南第二，其綽號是砲彈國王，因他猛烈地砲轟了麥西那（Messina）

市（一八四八年九月）五月十五日，是拿布勒斯的國會被解散之日。



類的供獻……當愛斯巴脫落王子 (Regent Espartero) 爲着效力國家 (這却是梯亥爾所從未做過的) 而用大砲轟擊了巴塞隆那城以鎮壓該城的暴動時，全世界到處起來發生了共同的憤怒的喊聲。』

十八個月之後，梯亥爾已是擁護法國的軍隊轟擊羅馬城的 (註) 最出力的一個人了。實在說來，砲彈國王的罪過，似乎僅僅在於把他的轟擊限於四十八小時之內罷了。

二月革命之前數天，梯亥爾在氛圍中感覺到了民衆大風暴的到來。因基淑 (Guizot) 之故而長期不得高位厚祿的情況，已使他討厭極了。於是梯亥爾裝起了假英雄態度 (爲了這，他博得了『蠅子米拉波』的外號) 在人民代表會議中宣言道：『我不但是法國的革命黨人，而且也是全歐洲的革命黨人。我希望革命政權常常握在一般溫和派的手裏……但如果一旦政權落入了心腸熱烈的人或竟急進派人的手裏，那我也決不因此丟棄我

(註) 一八四九年四月，法國軍隊出師擁護羅馬教皇反對意大利革命。砲轟羅馬，是對於法蘭西憲法

(它宣言「不用武力去破壞任何民族底自由」) 之重大的違反。

的目的。我總是屬於革命這一邊的。』

二月革命來到了。然而，這革命却没有像這小人所夢想的以梯亥爾內閣去替換基淑內閣。這革命竟以共和國替換了路易斐力伯。從民衆勝利的第一天起，他就小心翼翼地自己掩藏了起來，但他却忘記了工人們對於他的賤視，使他越出了他們的痛恨之外。這位有經驗的勇士，繼續的不敢出現於公共的地方，直至六月屠殺（註一）爲他那樣的人清除了道路的時候。然後，他大搖大擺的出來，變成了『秩序黨』（Party of order）及其議會制共和國的領導人物了，這個議會制的共和國，正是那時青黃不接時期的一個無名的過渡統治，在這統治時期，統治階級的一切派別互相勾結去壓倒民衆，同時又互相暗算，企圖按照自己胃口恢復皇朝。在那時候，和現在一樣，梯亥爾宣告共和黨人是鞏固共和國的唯一障礙；在那時候，和現在一樣，他對共和黨人所說的話，正像劊子手對唐·卡洛斯（Don Carlos）（註二）所說的話一般——『我要殺死你，但却是爲了你的好處。』現在呢，也像當時

（註一）這是指一八四八年巴黎無產階級底六月起義之被鎮壓。

中將他理想化。

——編輯部註

(註二)唐·卡洛斯(1545—1568)西班牙的王子，參加反對他父親的陰謀。席勒在其唐·卡洛斯悲劇一樣，他要在他勝利之後的第二天喊道：『L'Empire est fait (帝國已告成功了)』他忘記了他關於『必要的自由』的虛偽的話以及他個人對於拿破倫第三的怨恨了(他會被拿破倫第三愚弄，並被他一脚踢去了國會制度——而離開了國會的人工氛圍，這小鬼自己就要成爲一錢不值，這一點，當然是他所熟知的。)忘記了所有這些的梯亥爾，參加了第二帝國時代所有的一切可恥事件——從法國軍隊佔據羅馬一直到對普魯士開戰。他助長了普法戰爭，他破口辱罵德意志的統一，而他的辱罵德意志統一，並不是因爲看到這是普魯士的專制主義的假面具，而是因爲這種統一要危害法國世代相傳的因德意志不統一而獲得的權利。這個矮子在全歐洲的面前揮舞拿破倫第一的寶劍(他在歷史著作上，(註一)正是替拿破倫擦靴子。)事實上他的外交政策，從一八四一年的倫敦會議起到

(註一) 梯亥爾底主要歷史著作是法國革命史與執政政府與帝國的歷史。

——編輯部註

一八七一的巴黎獻城止，總是使法蘭西陷於極端的恥辱，而在現在的國內戰爭中，他居然靦顏得到俾斯麥的恩許，把西丹和美次的俘虜放回來屠殺巴黎了。他的才幹雖然機動，他的主張雖然易變，但他一生却是最總是懵然無知，而且是對於那已經顯露到外面來的最明顯的變動，也不能為他的頭腦所了解，因為他是一個把所有腦力聚到舌尖上的人。例如，他以為任何違反法國陳舊的保護貿易制度（註二）之傾向都是瀆神犯聖。當他做路易斐力伯的閣員時，反對建築鐵路，嘲罵鐵路為發狂的怪物齊曼拉（Chimera 獅首、羊身、龍尾之怪物，口噴毒火。——譯者）。當他在拿破倫第三之下變成在野黨時，又反對改革法國腐敗的舊軍隊制度，彷彿這是大逆不道的事。

在他一生長久的政治生涯中間，他從來沒有做過一件（那怕最小的）實際有用的

（註二）法國的保護貿易制度的特徵，是對於商品課高額進口稅（如對英國生鐵按其價值徵收百分之七十的進口稅，對於鐵則按其價值徵收百分之百零五的進口稅）。結果有許多不能在法國製造的工具與其他商品，就從市場上完全絕跡了。

事。問什麼是梯亥爾一生唯一的一貫之處，那只有他的貪財及其對於財富生產者的痛恨，他第一次到路易斐力伯之下當閣員時，窮得和『癩三』（上海俗語，意即指窮困落魄，幹流氓事業以生存之人。——譯者）一樣，到他下野時，已成了百萬財翁。在這國王下做最紅一次的閣員時（一八四〇年三月一日），他在人民代表會議中，公開被人控告侵吞公款，他那時不恤用眼淚鼻涕——這是廉價的商品，他和法佛勒及其他的鱷魚們所慣於使用的——去答覆公衆的這一控告。一八七一年在卜都（Bordeaux）的時候，挽救法國財政破產的第一個必需辦法，在他看來就是規定他自己每年俸給三百萬法郎，這就是他的『經濟共和國』開篇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這種『共和國』的觀念，他在一八六九年給巴黎選民們的宣言中已經指點出來了。他的一個一八三〇年時人民代表會議中的同事，叫做貝列（Bestay）的，本人是一個資本家，但却是巴黎公社的一個最忠心的社員，最近發表一篇檄文，告梯亥爾道——『使勞動為資本所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礎。從你看見勞動者的共和國在市政廳成立第一天起，你總是不斷的向法國大喊：『這些人都是罪犯

呵！他是一個在政府中耍小手段的大家，慣發僞誓，善於叛賣的名手，國會內黨派鬥爭中陰謀詭計和四出鑽營的巨匠；他失去位置的時候，總是毫不躊躇的煽起革命。在他握得了國家大權以後，總是毫不躊躇的使革命陷入血泊中，階級的偏見，代替了他的思想，虛榮代替了他的良心，他的私人生活是和他的社會生涯一樣，的卑鄙齷齪——就是在現在，當他扮演着『法蘭西的修拉』(Franch Silla)的角色時，他的滑稽的矯飾還是掩不住他的行爲的卑污。

巴黎的投降，不單是把巴黎，而且是把全法國獻給普魯士，這種投降，是九月四日的竊位者從九月四日竊取政權的時候起就開始的（像脫羅秀親口招供的那樣），一個長期通敵的賣國奸謀的總結。在另一方面，這投降又是他們得到普魯士幫助來進攻共和國及巴黎的國內戰爭的開始。陷阱早在投降普魯士的條件中安放好了。那時，約有三分之一的領土是在敵人手裏，京城與各省間的往來已被割斷，一切交通都已紊亂。在這種情形之下，要選出真正的法國的代表來，除非有很充分的預備時間，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投降的條款

中，限定一星期內選舉出一個國民會議來；這使得在法國有好多地方，關於選舉的消息只在選舉的前夜才送到。此外，投降條件上更說，這個國民會議的選舉，唯一的目的是在決定和平與戰爭的問題，在必要的時候，更要用來締結議和條約。民衆當然要感覺到這種停戰的條件尚簡直使繼續戰爭成爲不可能的事，唯有最壞的人才最適宜去訂立俾斯麥所定下的和約。但是，梯亥爾却不放心於那種戒備，他在停戰的祕密傳到巴黎以前，就已出發到各省去作選舉的旅行，想把合法黨（Legitimist Party）的屍體復活起來，使它與奧利恩派（Orleanists）共同來代替那在當時爲全國所棄的拿破倫派。他不怕合法黨，因爲這些人在那時的法蘭西成立政府，是沒有希望的，所以由他們來作對敵，是並不危險的；這黨的一切行動，像梯亥爾（一八三二年一月五日在人民代表會議的演說）自己所說的，是『以外國侵入，進行內亂及擾亂秩序三者爲其行動之源』的，所以它是反革命勢力最好的工具。合法黨衷心相信，他們所久已盼望的長期統治時期已經降臨了。的確，外國侵犯者的鐵蹄，正在蹂躪法國的土地；帝國已經倒了，拿破倫已經被捕；他們正可以爲所欲爲了。顯

然的，歷史的輪子已經將回去，停止在一八一六年的『無雙議院』(Chamfre introuvable) (註一)的時代了。在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之間，在共和國的議會中，他們的首領，是一些有教育的、對於議會鬥爭有經驗的人們；而現在湧上來的却完全是黨中的尋常人員——法國的各種混蛋。

當這個『地主會議』(Ruraux) (註二)在下都開幕的時候，梯亥爾甚至不許他們進行國會的討論而只是簡單的向他們申明和議的先決條件必須立刻承認，就為這是普魯士所一定要得的條件，只有在這條件上面普魯士才答應他們去向共和國及其要塞巴

(註一)是指法國在一八一六年的議院，其中大多數議員，是極端的保皇黨貴族底代表，以反動的性質著稱。

(註二)二月十三日在波爾多(Bordeaux)所召開的國民會議，大多數是公開的保皇黨(七百五十名代表中有四百五十名是保皇黨)大部分是地主底代表以及城市和農村的反動階層底代表。由此產生了『地主會議』或『農村貴族議會』之稱。



黎開戰。第二帝國已經把國債增加了兩倍，一切大城市都欠了極重的市政公債。戰爭極度地增加了負擔，並且將全國的財源毫無顧惜地汲盡了。此外，還有普魯士的歇洛克（Shylock，莎士比亞劇中的吝嗇的猶太商人——譯者）拿了債票要供養他在法國領土內的五十萬兵士，他要法國付五十萬萬的賠款，未付清的餘數，添加百分之五的利息。誰應當來付這筆賬呢？只有暴力推倒共和國之後，財富的所有者們才能夠希望把他們自己所惹出來的戰爭的費用轉嫁到財富的生產者身上去。因此，法國經濟的空前的破壞，刺激着這些土地和資本的忠心的代表者，在敵國軍隊的監視和保障之下，用國內戰爭及奴隸主的叛變去終止對外的戰爭。

在他們陰謀的前面，却站着一個極大的障礙物——巴黎。解除巴黎武裝，是成功的第一條件。於是梯亥爾就要求巴黎交出他的武裝來了，使巴黎不能再行忍耐下去的一切行動，都做出來了。『地主會議』舉行了反共和派的、狂暴的示威；梯亥爾自己也譏刺共和沒有法統的根據；廢除巴黎為首都的話也傳出來了，奧利恩派派出了他們的大使，杜福爾

(Dufaure) 頒佈了使巴黎工商業破壞的關於過期商業期票及房租的法令，因波野爾·克爾底爾 (Pouyer Querier) 的堅持，每種出版品每一本課以二生的稅金，勃朗基和弗羅倫斯 (Florens) 被判決死刑，共和黨報紙被封閉，國民會議移到了凡爾賽；為柏烈高 (Palikao) 所宣佈而在九月四日取消的戒嚴又復恢復了，十二月二日的英雄維諾衣 (Vinoy) 被派來做巴黎的總督了；帝國的憲兵瓦倫頓 (Valentin) 被任為警察總監；耶蘇將軍奧雷爾·特·巴拉丁 (d'Aurelles de Paladine) 被任為巴黎國民軍總司令。

現在我們還要向梯亥爾先生及國防政府中其他的人們，即梯亥爾的僕人們提出下面的問題：大家知道，梯亥爾經過他的財政總長波野爾·克爾底爾的手，借了一筆二十萬萬的債款，這債款，是要立即交付的。現在問：

一、據說按此中的勾當，該借款中有數千萬的數目是專為梯亥爾、法佛勃、畢加德、德、爾和西蒙等私人利益，而彼此分潤了的，此事是真是假？

二、據說該項借款，不到巴黎『平定』之後是不償付的，這話是實是虛？

無論如何，錢是非常需要的，因為梯亥爾和法佛勃曾用卜都會議會大多數的名義最無恥地請求普魯士軍隊立即佔據巴黎。但是這種把戲不在俾斯麥的政策之內，所以當他回到德國去的時候，公開的用譏嘲的口吻把這些事告訴那些洗耳而聽的法蘭克府的俗漢們。

## 二

武裝的巴黎，是對於反革命陰謀的唯一嚴重的障礙，所以巴黎非被要求解除武裝不可。對於這一點，卜都會議會是十分公開地主張的。即使地主議會中代表們底憤怒的鼓噪還不夠清楚的話，那末梯亥爾底讓出巴黎而把它拿來獻給十二月殺人犯維諾衣、拿破倫第三時代憲兵瓦侖頓和耶蘇將軍奧雷爾·特·巴拉丁三人所組織的三人執政政府來支配，這事是絲毫沒有可以懷疑的餘地了。這些陰謀者，並不掩蓋他們解除巴黎武裝的真意，可是同時又以最顯然最無恥的謠言為藉口，直接要求巴黎卸下自己的武器。梯亥爾聲明說，『巴黎國民軍的大砲是屬於國家的，所以應當歸還國家。』其實，事情是如此的：自從獻

城的那天，當俾斯麥的俘虜們把法蘭西出賣給他，並懇求了將一大部分軍力留給自己以爲壓迫巴黎之用的時候起，巴黎已經武裝起來了。國民軍自己已經改組過了，已把最高的指揮權完全付託給一個由全體國民軍兵士（除了拿破倫派的幾個部隊）所選舉出來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普魯士軍隊進入巴黎的前夜，中央委員會設法把投降的叛徒們奸惡地丟棄於將爲普魯士軍所進據的一帶地方之一些大砲和機關槍搬運到蒙馬德爾（Montmartre）、拉·維勒脫（la villette）和祕爾維爾（Belleville）等市區去。這些大砲本是國民軍自己集款置備的。在正月二十八日的投降書中，大砲曾被正式承認是國民軍的私有財產，因此當時未曾被列入政府繳給敵人的一般軍械中去。但是梯亥爾却因實在沒有理由來向巴黎民衆宣戰，所以乃不得不捏造無恥的謠言，說國民自衛軍的大砲是國家的財產！

謀奪此項軍械，很明顯的，自然不過是普遍的解除巴黎武裝的第一步，也就是要把九月四日的革命解除武裝的第一步。可是這個革命，已經是法蘭西合法的國家的形式。這次

革命的果實——共和國，已經在投降書上爲勝利者所正式承認了。在那次投降之後，它已爲一切外國列強所承認，並且曾經以它（共和國）的名義召集了國民會議。九月四日，巴黎工人的革命，是卜都國民會議及其行政部之唯一合法的基礎。假使沒有九月四日的那次革命，那末這個國民會議就應當把自己的權位讓給一八六九年在法蘭西統治之下而不在普魯士統治之下用普選法所選舉出來，以後又被革命所武力解散的立法院了。梯亥爾和他的『得到赦書的人們』也一定會向拿破倫第三投降，請求他簽字保護免得充軍到開茵（Cayenne）（註）去。能夠運用全權來與普魯士媾和的國民會議，僅僅是這次革命中的一個插話而已，至於革命的真正的體現者却還是武裝的巴黎，發動革命的巴黎，爲革命而忍受了五個月的圍困備嘗了驚恐與飢饉的巴黎，並且不爲脫羅秀詭計所動以持久的抵抗而使各省有可能進行堅決防禦戰爭的巴黎。可是現在，這個巴黎，在卜都叛亂的奴隸主的侮辱命令之下或者不得不實行解除武裝，並且承認九月四日的革命沒有別的意

（註）開茵（Cayenne）南美洲的法屬基阿那（Guiana）的首都犯人放逐地。

而只是把政權從拿破倫第三手裏轉給他的競爭者保皇黨人的手裏；或者，巴黎不得不用犧牲的精神挺身出來爲法蘭西事業而鬥爭，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當時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推翻造成第二帝國並且在帝國庇護之下使法國達到完全腐敗地步的那種政治和社會制度，只有這樣，才能把法蘭西從完全覆滅的災禍中挽救出來使它重新走上新生命的道路。忍受了五個月饑饉痛苦的巴黎，對於這種選擇是沒有片刻猶豫它的。它充滿着英氣勃勃的勇敢，它決定担受向法蘭西反革命陰謀家進行鬥爭的重負。雖然那時從堡塞上有普魯士的大砲向它威嚇亦所不顧。但是當時的中央委員會因爲對於威脅着巴黎的內戰抱着一種厭恨，所以縱有卜都議會之挑釁、行政部之橫加干涉以及大批軍隊之回集巴黎及其四周，它始終還是保持一種自衛的態度。

而當這個時候，梯亥爾自己先開始內戰了。他派遣維諾衣率領了好多警察和一些軍隊，在夜間作偷盜式的出征，以襲擊蒙馬德爾，意圖在彼處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奪取國民軍的大砲。這一企圖後來因爲國民軍的堅強抵抗以及軍隊和民衆的友愛聯歡而遭受

了失敗，這事是大家所知道的。可是在事前，奧雷爾·特·巴拉丁已經印好了勝利的公報，梯亥爾也早已預備好了告示來宣佈他完成政變所採取的辦法。現在梯亥爾不得不把這種公報和告示改爲另一宣言，在這宣言中，他宣佈他自己的『大量』決意將武器賞給國民軍，並希望使用這些武器來保護政府以與叛徒鬥爭。可是在三十萬國民軍當中，只有三百人響應這個宣言，願意集合到小人梯亥爾那邊去，擁護他來打他們自己的弟兄。三月十八日，光榮的工人革命完全統治了巴黎。中央委員會就成爲當時的臨時政府。歐洲各國一時還懷疑了這種眩人眼目的國家激變和軍事激變之真實性。難道這不是從久已過去的事件中所發生出來的大夢嗎？

從三月十八日到凡爾賽軍隊衝入巴黎的時間，無產階級革命完全沒有被『上等階級』的革命中尤其是他們的反革命中所固有的橫暴行爲所沾污。它（指巴黎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除了說它殺戮萊康德（Lecomte）和克萊孟湯姆（Clement Thomas）兩個將軍以及凡登（Place Vendôme）廣場上的衝突以外，是沒有其他藉口可以來非難

它的。

萊康德將軍是拿破倫的軍官，他是參加夜襲蒙馬德爾的一人，他曾經四次發令，命其部下第八十一團兵士射擊比加爾（Place Pigalle）廣場上赤手空拳的羣衆；當兵士拒絕執行他的命令時，他就備極卑劣地侮辱他們。當時他的部下，沒有去射擊赤手空拳的婦女和小孩，而却把他槍決了。受工人階級敵人長久薰陶的士兵習慣，在他們初轉到工人方面來的時候，自然一下子是不容易改變的。他們也殺死了克萊孟湯姆將軍。

克萊孟湯姆『將軍』從前是一個不得志的小軍需官，在魯易斐立伯在位時的末年，他加入共和派所辦的『國民報』的編輯部，在這些燥急的報紙上，他一面是負責的傀儡，（註一），同時又是作戰的鬥士。二月革命之後，國民報一派人把政權握到了自己手中，他們就把這位老的軍需官升任將軍，這還是六月屠殺的前夜的事。他在那次屠殺當中，與約爾·法佛勒同為兇惡的準備者，並且還在屠殺中起了最卑鄙的劊子手的作用。在那次事件

（註一）其職務是遇報紙被控告判罪時就由他受禁閉。



以後，他帶着他的將軍職位隱歿了好久，直到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一日，才又見他出現了。在那一天的前夜，（註二）被執於市政廳中的『國防政府』十二分莊嚴地允諾了勃朗基、弗羅倫以及其他的工作人代表們說，願意把他們所已奪到的政權轉交給巴黎民衆所自由選舉出來的巴黎公社之手。可是國防政府後來却食了約言，並且慫恿脫羅秀將軍的布里頓（Bretons）（這些布里頓人現在代替了拿破倫的高爾西根人 Corsicans 的地位）來

（註二）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曾企圖了推翻國防政府而奪取政權。引起這個運動之動機，是下面這些風傳說：法國方面行將與普魯士軍成立休戰，國民軍在蒲爾熱敗北，麥次出降。國民軍有一隊（大部分是由工人所組成的）在勃朗基主義者領導之下佔領市政廳，宣佈推翻舊政府，成立新政府，由新政府組織公社的選舉。但新政府並沒有以廣泛的羣衆為基礎，而表現不堅決與動搖。它與被扣的國防政府的官員開談判，得到了他們的口頭上的允許，說在十一月一號舉行公社選舉，並宣佈大赦。在這個時候，資產階級的警備軍有幾隊被調到市政廳來，在十一月一號早晨，他們佔領了市政廳，恢復了國防政府的權力。

反攻巴黎。當時唯有泰米西（Tamisier）將軍一人不願意幹這種不守信義的勾當，辭去了國民軍總司令之職。代替他職位的克萊孟湯姆因此又做了將軍了。在克萊孟湯姆做總司令的服務期間，他不是與普魯士人作戰，而是與巴黎國民軍作戰。他竭其全力阻止他們的全體武裝；他嗾使資產階級的幾營部隊來攻打工人的隊伍；他排斥了許多不同意於脫羅秀『計劃』的軍官，並且誣蔑無產者幾營兵儒怯而加以解散；可是這幾營部隊的英勇果敢，現在就是最狂暴的敵人，也對之驚奇不置的。克萊孟湯姆現在覺得十二分的驕傲，因為在他又能在實際上表示出他個人對於巴黎無產階級的仇視，這種仇視在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屠殺中，是已很顯赫地表現過了。在三月十八日以前的幾天，他把自己『根本結束巴黎惡徒之花』的計劃，呈到軍事總長李福洛（Leflo）面前去。到了維諾衣失敗以後，他又不得不裝着愛好藝術的假相，充當間諜來現身於舞台之上。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工人對於克萊孟湯姆和萊康德兩人之被殺所負的責任，正像威爾士（Wales）公主對於當她進倫敦那一天因擁擠過甚以致有些人被踏死的那事所負的責任一樣。

所謂凡登廣場上屠殺赤手空拳的民衆，這簡直是一個子虛烏有的神話。梯亥爾和地主議會中的代表們永遠對於那件事一字不提，實不是無因的。散佈這點的任務，他們委託給歐洲新聞界的奴僕們去幹了。

『保守秩序的人們』——巴黎的反動分子們，一聽到三月十八日革命勝利的消息，大家都戰慄起來了。在他們看來，這革命的勝利就是民衆壓迫的接近。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事件那幾天直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註）遭他們毒手殺害的那些犧牲者底冤鬼們，都在他們面前站起來了。但是他們所受的唯一處罰，只是這種驚惶罷了。警察們不但沒有被解除武裝或被幽禁起來如所應做的那樣，而且大開巴黎之門讓他們自由的逃往凡

（註）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又發生一個新的推翻國防政府的企圖。暴動底直接原因是國民軍在波達維爾（Bucenvall）之敗北（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九日），行將休戰與任命維諾衣將軍爲巴黎軍事司令官之謠傳。一月二十二日的暴動，正與十月三十一日的暴動一樣，其特徵就是決斷不足團結不夠，並且對羣衆的組織聯絡也不夠，在鎮壓這次暴動時，死傷三十人，其中有婦女與小孩。

爾賽去。那般『保守秩序的人們』不但沒有遭受任何傷害，而且還給與他們在巴黎中心集合力量，鞏固他們許多地位的可能。中央委員會的這種謙讓，武裝了的巴黎工人的這種寬宏大量，按照那般『秩序黨』的習慣來看，是如此的奇異，使得這些秩序黨人竟加以誤解，以為這是工人們自覺能力薄弱的表現。這就是為什麼『秩序黨』人想到了那樣無意義的計劃，要用和平的示威遊行的方法來獲得維諾衣曾用他的大砲所沒有得到的東西。三月二十二日，從最華富的市區，出現了叫囂不堪的一夥『時髦的人士』，所有巴黎城中的『闊人少爺』都參加，為他們首領的，都是些最昭著的皇親國戚——如海開倫 (Heeckeren) 可哀脫羅恭 (Coetlogon)、安黎本 (Henri de Pene) 之類的東西。這一羣懦怯地以和平遊行爲名的暴徒們，祕密地用殺人犯的武器武裝起來，把他們於遊行中在街上所遇到的許多國民軍巡查員與哨兵加以侮辱並解除武裝。當他們從和平街出來到凡登廣場的時候，他們便高聲狂喊：『打倒中央委員會！』『打倒僧子手！』『國民會議萬歲！』同時企圖衝破自衛軍哨兵的警戒，猝不及防地襲取在該警戒線之後的國民軍的總司令部。

對於這般暴徒們的手槍射擊的回答，起初僅僅是採取普通的驅散行動。可是，當後來一見這個方法不發生效力的時候，國民軍指揮官就下令發槍還擊。一次射擊就把那些『空頭』的烏合之衆打得四散奔逃，這些人夢想着以爲只要『體面社會』一出現，對於巴黎革命就會發生像依蘇那維納的喇叭聲對於葉利巷城壁所發生的那樣的影響。被這些逃奔的『遊行者』殺死的，有國民軍二人，重傷者九人（在這九人當中，一個是中央委員會的委員。而在這次『秩序黨』人的偉業所發生的地方，到處都散棄着他們的手槍、刺刀、寶劍等一類的武器，這正是他們的『徒手』的『和平示威』的證物！可是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那一天，當國民軍爲了抗議法蘭西軍隊之窮兇極惡地攻佔羅馬而舉行真正和平的示威之時，當時『秩序黨』的將軍向加爾尼（Changarnier）就令其軍隊四方面向這般徒手遊行民衆衝來，把他們槍斃的槍斃，刀斬的刀斬，用馬蹄踐踏的用馬蹄踐踏，而這樣的向加爾尼，却因這次的屠殺而被國民會議——特別是梯亥爾——推崇爲『祖國的救主』。巴黎當時宣佈了戒嚴，杜福爾就急在國民會議中通過了許多壓迫民衆的法令，實行許多

新的拘捕與充軍，形成了新的恐佈的統治。但是那時『卜等階級』的行動却同他們相反。一八七一年的中央委員會，簡直沒有注意到那些四散奔逃的『和平示威』的英雄們，所以以在二天以後，他們就能夠在海軍大將賽士（Saisset）的統率之下舉行他們的『武裝』示威遊行，而其結果，則是羣向凡爾賽逃奔，這是他們預先打算好了的。中央委員會對於由梯亥爾夜襲蒙馬德爾所引起的國內戰爭，還是堅持拒絕，這簡直是重大的錯誤。當時它應該立即令軍隊追到當時沒有充分防禦的凡爾賽去，把梯亥爾及其『地主會議』的陰謀一次的斬草除根。中央委員會不但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容許『秩序黨』重新能夠在三月二十六那一天的巴黎公社選舉中試用它底力量。（註）在那天，『保守秩序的人們』在巴黎的各市區大作其調和的演詞，表示願意同他們的過於大度的勝利者言歸於好，可是在他們心中當然是在莊嚴地立誓要在相當時候將他們屠殺消滅。

（註）馬克思在寫給顧格曼的信（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中已說到了中央委員會底這些致命的

錯誤。

現在來看一看另一方面吧。梯亥爾在四月初向巴黎作第二次的進攻了。對於被俘到凡爾賽的第一批巴黎人，採取了最殘酷的手段。歐納斯特畢加爾把兩手插在袴袋中，在他周圍走來走去，並且譏笑着他們，而在尊貴（？）太太們圍繞中的梯亥爾夫人和法佛勒夫人等，則從樓台上對凡爾賽暴徒的罪行拍手喝彩。被捕的戰鬥部隊的兵士們，就被當場槍斃。我們勇敢的朋友杜佛爾（Duval）將軍——他是一個鑄匠——不經過任何的審訊手續即被槍決了。嘉里弗（Glifer）他的妻子在第二皇朝的御宴席上，曾何等不要臉的脫光她的身體給大家看的，在宣言中自己誇耀說，正是他把當時被他衛隊所突然包圍與解除武裝的一小隊國民軍及其隊長與副官加以屠殺。從巴黎逃出的維諾衣，因為他發佈了命令要槍殺從公社方面捕來的任何作戰的兵士，就從梯亥爾那裏得到了大勳章。憲兵台思馬朗，因為他像屠夫一樣，將勇敢的與寬大的佛羅倫——就是那個於一八七〇年十月十一日救了國防政府官吏的頭的佛羅倫——切成細片，也得到了獎章。關於殺他的『動人的詳細情形』，梯亥爾很滿意的在國民議會的一次會議上作了敘述。他如像那種得人

家批准而扮演太美朗（Tamerlan）的國會小子一樣，帶着自大的虛榮，拒絕給與那些起來反對他這卑賤小人的起義者以交戰的對方的權利，他甚至不承認他們的救護站有中立的權利。猴子如一旦得到滿足其老虎本能的權力，就比什麼東西都壞（關於這種猴子，伏爾泰 Voltaire 曾經給我們描寫過。）

巴黎公社在四月七日，發佈了以報復相威嚇的訓令，並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在於『保護巴黎不再受凡爾賽強盜的虐殺，並要求以眼還眼，以齒還齒。』但在這以後，梯亥爾對於被捕者的野蠻行動，還是依然如故；他還是那樣的侮辱他們，在他的日刊上說『忠實人可憐的日光從沒有見過，再要墜落些的面孔，再要墜落些的民主派。』這所謂忠實人，正是像梯亥爾及其領着赦書的黨徒之類的人！可是槍殺被捕者的行動暫時是停止了。但當梯亥爾同他的將軍們——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政變的英雄——知道了巴黎公社的報復的佈告，不過是一種恐嚇，沒有發生實際結果，知道了就是混進國民軍中以後被捕的偵探以及帶着放火的彈藥因而被捉的警察，也遭到赦免；於是，他們又開始大批槍殺被捕者，一直繼



續到最後。國民軍躲藏的房子，被衛兵所包圍，四周灌以洋油（在這次戰爭中，第一次用到了它）加以焚燒，燒焦的尸身，後來爲台爾恆街印刷所的救護站所運出。四月二十五日在貝爾愛彬被馬隊繳械的四個國民軍兵士，被這馬隊的隊長（值得加里弗的讚揚的）一個個槍斃了。其中有一個兵士叫希勿爾（Scheffer）的，雖中槍而實未死，他拚命地蛇行至巴黎砲台，將這件事實告訴了公社的一個委員會。當託蘭（Tolan）對於這一委員會的報告向軍事總長李弗洛提出質問時，『地主議會』的代表們，竟用狂喊的聲音蓋住他的發言。並且，不准李弗洛去作答覆。竟敢激起他們『光榮的』軍隊的行動來，這簡直是侮辱當梯亥爾的刊物以肆無忌憚的口氣登載出在母林沙蓋（Moulin Saquet）打死睡着的公社社員，在克拉馬爾（Clamar）實行大批屠殺的消息時，就是向來不大有感覺的倫敦泰晤士報也覺得有些刺眼。但是要一一數出砲擊巴黎，在外國侵略者保護之下發起奴主暴動的那種人底暴行，那簡直是無效的嘗試。在所有這些暴行中間，梯亥爾把他關於自己的那矮子肩膀所負擔的可怕責任之國會辭令忘記了。他在他的刊物上驕傲地說道，會議很和好

的召開着（I Assemblée siege Paisiblement）並且以他同自己將軍們（十二月政變的英雄們）以及同德國學者們的歡宴，來證明他的胃口非常好，就是萊康德與克萊孟湯姆的鬼影也不能使它受到絲毫的損失。

## 三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早晨，巴黎爲『公社萬歲！』的如雷的喊聲所驚醒了。但公社，這給予資產階級的腦筋以如此難題的士芬克斯（Sphinx 希臘神話中人頭獸身的怪物。——譯者）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在中央委員會三月十八日宣言上面說道：『巴黎無產階級，看到統治階級的失敗與叛變，知道他們應該起來將社會事務的管理權拿到自己的手裏以拯救國家的時間，已經到來了……他們懂得他們有至高的責任與絕對的權利來做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翁，並把政權拿到自己的手裏。』

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現成的國家機關而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註）

（註）馬克思在這裏明白陳述巴黎公社底根本教訓之一。馬克思與恩格斯以爲這個教訓是有偉大的意義的，這從他們在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寫的共產黨宣言序文中所說的話就可很明顯地看出來。在序文中說，共產黨宣言底綱領，「在某些地方是過時的。特別是巴黎公社證明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現成的國家機關，而運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對於這一點，列寧寫道：

「非常令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恰恰這個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曲解了，而共產黨宣言底讀者即使沒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十分之九不明瞭這個修改的意思。對於我們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底名言之流行的庸俗的「了解」在於認爲似乎馬克思在這裏着重遲緩發展底觀念而與奪取政權對立起來，諸如此類等等。」

「實際上正是相反。馬克思底意思就在於：工人階級應當破壞並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僅限於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就是說，正在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寫給顧格曼的一封信裏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倫第三政變記一書最後一章，你就可以看見我認爲法國革命以後的企

圖，是在於並不是把官僚和軍事的機器從一手轉交他手，如今日以前一樣，而是要破毀它，而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的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正是如此。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底企圖，也恰恰就在這裏。」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俄文至少有兩種版本，其中有一種版本是由我校訂並由我作序的。

「破毀」（官僚和軍事的國家機器）這幾個字，已經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的任務問題之主要的教訓簡明地表白出來了。現在盛行一時的考茨基主義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所完全忘却了的，並且公開曲解了的，也正是這個教訓！（列寧國家與革命，中譯本「解放社」版列寧選集，

第十二卷五二頁）

——編輯部註

集中的國家政權及其到處存在的，基於系統的與階層的分工原則而建立起來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與法官），自絕對君主時代起即形存在，那時它是充當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向封建制度作鬥爭的有力的武器。但貴族的與地方的特權，城市的與行會的壟斷以及各省的法規，——一切這些中世紀的廢物阻止了它的發展。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的大掃帚，把所有這些陳舊的骯髒的東西一掃而盡，並為現代的國家建築廓清了社會

的基礎。這座建築，在第一帝國時代（這帝國本身是在舊的半封建歐洲聯合反對法蘭西的戰爭（註一）中造成的）已經成立起來了。在統治形式往後的發展中，政府服從了國會的統制，即服從了資產階級的直接的統制。它一方面變成了廣大的國債與重稅的出產所，它所擅有的行政力量，收入與位置，吸引了統治階級中的競爭的黨派與冒險家，使他們把它變成了爭奪名利之場；他方面，在社會經濟變動的影響之下，它的政治性質也變動了。隨着現代工業的進步，使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往前發展與深入，同樣的國家的政權，也愈是獲得了奴役工人階級的社會權力的性質，即階級統治的機器的性質。每一次革命表示出階級鬥爭已經進了一步，在每一革命之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也愈是表顯得明白了。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把政權從土地所有者的手裏奪下來交給了資本家，就是說，從工人階級較遠的敵人手裏奪下來交給了它的較近的敵人。資產階級的共和黨人，以二月革命的名

國的戰爭。

（註一 這是英俄普奧及西班牙等國聯合起來反對革命的法國之戰爭後，來是反對拿破倫第一底帝

義奪取了國家的政權，並且利用了這政權舉行了六月的屠殺，這種屠殺告訴了工人階級，所謂『社會的』共和國，不過是共和國對於他們的社會的奴役，同時又告訴了保皇派的有產者與土地所有者階級，他們可以安心的把管理的麻煩與其全身的利益交給有產者的共和黨人。但是，在這一次六月的大事業之後，有產的共和黨人不能不從『秩序黨』的首列退到最後一列，——一種由有產階級所有各個敵對的黨派組織起來的聯合，他們現在同生產階級公開對抗；他們共同管理的最適宜的形式，是那以拿破倫為總統的國會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個狂暴的階級恐怖政府以及有意侮辱『下流羣衆』的政府。照梯亥爾講，國會主義共和國，是使統治階級的各派別最少分裂的一種統治形式，可是它在人數很少的階級與生活於這階級之外的全部社會機構二者之間，却挖了一條鴻溝。如果在從前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執使國家的政權受相當的限制，那末，現在因為有產階級的聯合，這種限制已經沒有了。由於無產階級的起義的威脅，聯合起來的有產階級，便狂暴地、無情地利用國家的政權，作為全國內資本壓迫勞動的武器。但是，反對生產者羣衆的十字

軍的征伐，一方面不能不以更大鎮壓抵抗的權力給與行政當局，在另一方面，又從國會的堡壘（國民會議）逐漸剝奪它反對行政當局的一切工具，結果，代表這行政當局的拿破倫第三驅散了這些有產階級的代表。所以，第二帝國實是『秩序黨』的共和國的自然結果。

這一以國家政權爲誕生證書，以普選爲批准，以寶劍爲王笏的第二帝國，聲稱要依靠於農民，即依靠於那沒有直接參加資本與勞動間的鬥爭之廣大生產羣衆之上。帝國自稱是工人階級的救主，其根據是說它破壞了國會主義以及與之一起的政府對於有產階級的公開的服從，同時它又自稱爲有產階級的救主，其根據是說它擁護有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經濟的統治。最後，它聲稱要聯合一切階級於國家光榮的，重新復活的怪物的周圍。事實上，在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統治能力，而無產階級尚未得到這種能力的時候，帝國是唯一可能的統治的形式。全世界歡迎這帝國，把它看作是社會的救主，在它的統治之下，資產階級社會解除了政治的顧慮，達到了他所夢想不到的這樣高度的發展，工商業大大的

擴張起來，交易所的投機，慶祝着自己縱橫世界的歡樂；民衆的貧困，同無比的奢侈（用欺騙與犯罪得來的）尖刻的互相對照着。表面上高高立在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正是這一社會的最大的恥辱與一切可鄙東西的養成所。渴望把這一統治制度的重心從巴黎移到柏林去的普魯士刺刀，將這國家政權及其所拯救的社會之一切腐敗都揭露出來了。帝國主義（是指法國帝國的統治形式，即拿破倫主義——譯者）是新興資產階級社會所建立的國家政權（這政權曾爲它用來作爲從封建社會解放出來的工具，並且在它完全發展時，轉成替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之最娼妓化的最後的形式。

公社是同帝國直接相反的。巴黎無產階級用了歡迎二月革命的『社會共和國萬歲』的呼聲，不過是表現出他們要想建立這種共和國（這共和國不但要消滅階級統治的專制公式而且根本消滅階級的統治）的模糊的傾向。公社就是這種共和國的確定的形式。

巴黎曾是舊政權的駐在地與中心，同時也是法蘭西工人階級的社會中心。這個巴黎，



拿着武器實行起義，反抗梯亥爾及其地主議會要將帝國所遺傳下來的舊政權恢復起來並傳之百世的那種企圖。巴黎之所以能夠抵抗者，只是因為在普軍的圍困之下，它沒有了軍隊而有國民軍來代替，這種國民軍，大部份是由工人組成的。這事實必須成爲堅固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條命令，就是關於廢除常備軍代之以武裝民衆的命令。

公社是按照普選制，由巴黎各區域選舉出城市代表來組成的。他們是完全負責的並且隨時可以更換的。他們的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被認爲是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應當不是國會的機關，而是工作的集體，聯合立法權與行政權於一身的。（註）向來爲國家政府

（註）公社是一個新形式的國家，關於這種特徵，列寧寫道：

「不是議會的而是工作的」機關——這是直接對準着現代社會民主黨議員們和國會「守房門的小狗們」說的！請看任何一個議會的國家，由美國至瑞士，由法國至英國，挪威等等：真正的國家大事是在後台辦理，而且由各行政部、事務處、參謀部執行的。而在國會裏，僅僅藉空談來達到愚弄「平民」的特殊目的而已。」

「巴黎公社」採用了新的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底賣身的腐敗的代議制，在這種新的制度之下，判斷和討論的自由，就不是一種騙人的勾當，因為代表們必須自己工作，必須自己執行他們自己的法律，必須自己來檢察實際生活所得的結果，而且還必須自己直接來對選舉者負責。代表機關此地還存在着，可是作為一種特殊系統，作為立法和行政分工以及作為議員們之特權位置的這種代議制，已經沒有了。」

「要把官吏制度到處立刻澈底消滅，這是談不到的。這是一種烏託邦。但是一舉而把舊的官吏機關打破，而立刻開始建設一個新的組織，使漸次能夠消滅一切官吏制度——這並不是一個烏託邦，這是「巴黎公社」底經驗，這是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直接的當前的任務。」（列寧國家與革命，中譯本「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二卷，四五四、四八頁）

——編輯部註

的工具之警察，立刻被革除了它的一切政治機能而變為公社的負責機關，隨時可以調換。其他一切行政機關的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為社會服務的人員，都只給以工人的工資。一切國家最高官吏的特權與辦公費，現在都隨着這些官吏本身的消滅而同歸消滅了，社會的任務，不再是中央政府寵兒的私產了。不僅是城市的管理，而且一

切向來屬於國家的主動權，都歸於公社了。

在消滅常備軍與警察（舊政府的物質權力的武器）之後，公社立刻開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即教會的力量。它下令解散並沒收一切擁有財產的教會。教士們應當回復到他們前輩（使徒們）所過的刻苦的生活中去，依賴信男信女的慈悲來生活。一切學校脫離國家與教會影響，大家可以免費進去。這樣，學校教育變成了大家可以享受的東西，科學上被階級成見與政權所加上的桎梏，也被揭去了。法官的表面上的獨立（實際上不過遮蓋他們對於交替着的政府的服從）也被取消了。他們對於每一政府，曾經宣誓盡忠到底，可是對於每一政府，也曾經叛變不顧，他們如像社會的其他公僕一樣，現在也變成公開選舉的、負責的與可以調換的了。

巴黎公社，自然應當是法國一切大工業中心的榜樣，公社一建立於巴黎與其他次要的中心，那集中的政府，在各省也要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機關。在公社尙未能詳細規劃定的全國公社組織大綱中，明顯的說明公社甚至應該成爲最小鄉村的政治形式，而全國

常備軍，應由短期供職的民兵來代替。在一區 (arrondissement) 的主要城市召集的全權代表會議，應當管理這一區內一切鄉村會社的公共事務。而這些區的會議，應當派全權代表到召集於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去；全權代表嚴格遵守選民的指令並且任何時候可被更調。其餘尚被留給中央政府的不多可是重要的那些職能是不應當被廢除（說廢除是故意胡說）的，而是應該轉交給公社的即完全負責的官吏。國民的統一不但不因公社的建設而破壞，反因這建設而組織起來。由於國家政權的消滅，這種統一變成了真正的統一，這種國家政權，雖自以為是這統一的具體的表現，自以為是超於國民之上，離國民而獨立，可是實際上却不過是國民身上的寄生蟲而已。在破壞了只為壓迫之用的舊政權機關之後，公社便從這個自以為是超越社會之上的政權手裏，奪下它的合法的職能，而把它們交給負責的社會公僕。現在不是像以前那樣，人民三年一次或六年一次選舉某一個統治階級分子，到國會（註）中去代表人民與壓迫人民，現在普選權應當為那些組織於公社中的人民服

（註）關於議會制度的這一個特徵，列寧寫道：

「馬克思對於代議制這一種特有的批評，由於現在社會國家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統治，也被人「忘却」了。」

每數年一次去解決統治階級中何人應當在國會中來摧殘和壓迫民衆——這便是資產階級的代議制的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立憲的君主國更是這樣，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中也一樣。（列寧國家與革命，中譯本「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二卷四四、四五頁）

——編輯部註

務，正像個人的選舉權爲僱主服務，替他的企業挑選工人，管理員與管賬員一樣。大家知道，社會正像個人一樣，常常能夠爲其自己的實用事業找到適當的人選，就是有時犯了錯誤，也能夠很快地把錯誤改正。另一方面，公社依照它的本質，自然反對把等級的官職授任去替代選舉制。

新的歷史創造的通常命運，是在於它們（指新的創造。——譯者）往往被人家看做是舊的，已經過去的，同它們有些相像的社會生活形式之照像。新的公社也是如此。破壞了現代國家政權的巴黎公社，也被人家看做是在這國家政權發生以前存在的並且以後爲

這國家政權基礎的中世紀公社之復活。人們很錯誤的以爲公社的建設，是企圖以小國家的聯合（孟德斯鳩與基龍特派（註）曾夢想了這點）去代替大的民族的統一，這種統一雖是用暴力造成，但現在却已成爲社會生產的有力的因素了。人們也錯誤的以爲公社與國家政權的對立，是反對過渡集中的舊鬥爭的擴大形式。在某幾個國家內資產階級政府形式的充分發達（法國是其標本），曾爲某些特殊歷史條件所阻礙，這些條件如在英國就造成這種情形，就是主要的中央之國家機關，還有納賄藏垢的教育委員會（Yestries），自私自利的市政委員，城市內貧窮法的狠心的督察者與鄉村中實際上世襲的法官來加以補充。公社的建設將能把那些直到現在爲這「國家」寄生蟲所吮取的力量（這寄生蟲

（註）基龍特派是法國大革命時代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要使革命失去領導，要削弱革命力量的集中，所以企圖把法國轉化爲一個聯邦國家，並破壞革命巴黎之領導作用（在巴黎甲可資派——急進小資產階級政黨——所領導的市社成了革命羣衆反對基龍特反動的革命鬥爭組織中心。）

依社會爲生並阻止社會的自由發展）重新還給社會。只此一點，它便足以幫助法蘭西的復活了。

各省城市的資產階級，以爲公社是企圖恢復路易斐立伯時代他們對於鄉村的統治，這種統治，在拿破倫第三時代，是被鄉村對於城市的假裝的統治所排除了。實際上，公社的建設是要將鄉村的生產者放在他們區域的主要城市的思想領導之下，並在那裏保證有那些城市的工人來作爲他們利益的天生的代表。公社存在的本身已經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地方自治，但這地方自治，已不再和那種現在已經無用的國家政權相對立了。只有俾斯麥那種人，這種人，除了以鐵與血爲首的陰謀以外，常時喜歡重操舊業，爲那個適合於他思想力的『Kladderadatch』雜誌（柏林的滑稽雜誌）撰文——只有這種人，才會想到說，巴黎公社本質上是要做效普魯士的城市組織（這種組織實是一七九一年法蘭西城市組織的滑稽模倣，它使城市政府變成普魯士國家警察機關的附屬輪子）在消滅了軍隊與官僚的兩大宗用款之後，公社實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廉價的政府。公社

存在的本身，便是專制政體的否定，這專制政體，至少在歐洲是階級統治的經常的重負與不可避免的假面具。公社給共和國築下了真正民主機關的基礎。但是，不論是『廉價的政府』或是『真正的共和國』都不是它的最後目的，兩者都不過是它的附帶物而已。

對於公社的解釋之多以及公社內所反映的利益之多，證明出它是異常生動的擴展的國家形式，而一切以前的政府形式，則在他們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公社的祕密，就是在它本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階級反對佔有階級的鬥爭的結果，是最後終於發現的，並在其中能夠完成勞動底經濟解放之政治形式。（註）

（註）列寧分析了馬克思從巴黎公社經驗中所得到的極端重要的教訓。他寫道：

『烏託邦主義者，從事於各種政治形式之「發明」，使社會主義的社會的改造得在這些形式之下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對於任何政治形式的問題都置之不理。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認為代議制的民主國家底資產階級的政治形式，是不可超越的界限；他們在這個「標本」之前祈禱，碰破了頭額，並且把每一個打碎這些政治形式之企圖，都稱為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之全部歷史中得一結論，國家是必然要消滅的，而國家消滅之過渡時期（從有國家到沒有國家的過渡時期）底政治形式，就是「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馬克思並不去發明這個本來的政治形式。他只限於確切地考察法國歷史，並且在一八五一年得出結論：事情是在於進到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當無產階級底羣衆運動爆發了的時候，雖然這個運動是失敗的，短期的，而且顯然是孱弱的，而馬克思却開始去研究，這種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政治形式。

「公社」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終究發現了」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之中，勞動底經濟解放是可以實現的。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第一次企圖，並且是「終究發現了」的政治形式，這個政治形式是可以而且必須來代替已破壞的國家機器的。

「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俄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不同的環境之中，和不同的條件之下，繼續着「巴黎公社」底事業，並且證實馬克思那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之正確。」（列寧國家與革命，中譯本「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二卷，五五——五六頁）

如果沒有完成勞動底經濟解放的條件，那末公社的建設將是不可能的東西，將是一種幻想。生產者的政治統治不能與他們社會的奴隸狀態的永久化並肩而存。所以公社應當是一種工具，能用來根除階級存在及階級統治所依據的經濟基礎。只要勞動一解放，大家就都是工人，於是生產的勞動不再是某一階級的特徵了。

奇怪的事：雖然最近六十年內，關於勞動解放的著作與言論屈指難數，可是，只要工人們在某一地方把自己的事拿到自己手裏的時候，立刻就發生了現代社會（這社會帶着資本與僱用勞動的奴役之兩個極端，在這社會中，土地私有者不過是資本家的不做聲的夥伴而已）擁護者的辯護的聖歌。似乎資本主義社會，還在處女的純潔與天真底時代！似乎它的對立還沒有發展，它的自欺還沒有炸破；它的娼妓化了的實際還沒有被揭破！他們說，『公社——要破壞為一切文明基礎的私有財產！』是呵，親愛的先生們，公社要破壞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之階級私產；它會要剝奪剝奪者；它會要使現在主要成爲奴役勞動的工具與剝削勞動的工具之生產手段，土地與資本變為自由的與聯合的

勞動工具，以造成真正的個人的私產。

但是，這是共產主義，這是『不可能的』共產主義！可是在統治階級中竟有些人（而且這些人也並不少）懂得現在的狀況是不能長久存在下去的；他們變成了合作生產的到處傳播、大聲疾呼的鼓吹者了。如果這種合作生產不是一句空話，不是一種欺騙，如果它應當排除資本主義制度，如果這種聯合能依照整個計劃來組織全國生產，把它拿來自己管理，並以此方法去終止在資本主義生產下所不可避免的經常的無政府狀態與定期的恐慌，——那我們試問你們，親愛的先生們，這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不是？

工人階級並沒有向公社要求奇蹟。工人階級並不想用民衆的決定去實現現成的與完滿的烏託邦。他們知道，爲要得到他們自己的解放，爲要達到現代社會因本身經濟力量的發展而強烈的追求着的更高生活的形式，它必須經過堅持的鬥爭，經過完全改造人與環境的許多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去實現理想，而是要去解放那些在舊的崩潰着的資產階級社會中已經成長起來的新社會原素。

完全知道自己歷史使命並充滿英勇決心來完成這種使命的工人階級，將以厭惡的微笑去回答那些奴僕的新聞記者的惡罵，去回答那些藉辭科學正確性的奧妙口氣說出愚昧濫調與宗派妄談的資產階級好心信條主義者的博學的教訓。

當巴黎公社負擔了革命的領導，當簡單的工人第一次決定侵犯到自己『天生主人』（有產階級）的特權，即其管理的特權之時，他們是在空前艱難的條件之下進行工作的，他們很虛心地、很誠意地而且很有成績地執行他們的工作；他們報酬的最大限度，沒有超過倫敦學校委員會書記所得薪金（如科學界的權威黑胥黎所說之數）的五分之一。但當舊世界看到紅旗——勞動共和國的象徵——飄揚於市政廳時，它真是氣得發抖了。

這是工人階級被公開承認為唯一的尚有社會創造力的階級之第一次的革命。就是巴黎的中等階級——小販、手工業者、商人，也都承認這一點，只有有錢的資本家是除外的。公社很聰明的解決了常為小資產階級內部爭論原因的債權與債務問題，而拯救了這一階級。（註）這一部分的小資產階級曾參加了一八四八年對於六月工人暴動的鎮壓，可是

(註)國民軍底中央委員會，在三月二十日還把期票之支付延期至一八七一年十月一日。在四月十八日，巴黎公社頒佈命令，所有債務延期三年償還。

——編輯部註

接着不久立憲會議便立即毫不客氣地使他們成爲他們債主的犧牲品。但他們走到工人方面來不但是爲了這一原因，他們還感覺到在他們前面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公社，或者是帝國，不論其所打的招牌是什麼。帝國盜竊社會財富，保護交易所投機事業，用人工方法促進資本的集中，並因此而引起了一大部分中等階級遭受剝奪。這樣，在物質方面，帝國只能使中等階級破產；在政治上，帝國壓迫中等階級；在道德上，它奢華浪費，使中等階級惱怒。它將中等階級子弟的教育交給「無知之徒」，侮辱伏爾泰的思想（即思想自由，仇視教會與宗教的思想。——譯者）；它把中等階級拋入於戰爭之中，而經過戰爭的一切災害後所得之報酬，却只是帝國的顛覆，因而又激怒了中等階級的民族感情。自拿破倫第三的高等官僚與資本家的孤羣狗黨自從巴黎出奔之後，以『共和主義者聯盟』(Union Republicaine)名義出現的中等階級的真正『秩序黨』，走到公社的旗幟之下，擁護公社，反對梯

亥爾的誣蔑。至於這種中等階級的羣衆能否支持過現在的難關，那將來就會知道。

公社有充分的權利對農民說：『我們的勝利，就是你們的希望！』凡爾賽所放出的，歐洲報館的高貴浪人所傳給全歐洲的最下流的誣蔑，是說國民會議中的地主，是農民的代表。法蘭西的農民，對於他們在一八一五年後不得不償與十萬萬贖金（註一）的人突然發生愛情，這不是該當的嗎？從法蘭西農民眼中看來，大土地私有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於他們一七四九年的勝利之掠奪。一八四八年，有產者更對農民土地徵收附加稅，一法郎加徵四十五生丁（註二）可是這事他們却是以革命的名義來做的。現在他們却挑起反革命的

（註一）在拿破倫第一顛覆之後，波濤王朝重復當權，它決定對於法國貴族在法國大革命時代被剝奪的土地，給與賠償。償給貴族的款項，計十萬萬法郎。

——編輯部註

（註二）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加徵「四十五生丁附加稅」，其目的是要引起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之磨擦。政府藉口養活工人的必要來作為徵收此稅之理由。對於農民所徵收的稅，增加了差不多百分之五十，這使農民起來反對革命與共和國。

——編輯部註

國內戰爭，爲得要把他們所應支付給普魯士人的五十萬萬賠款的主要重負，加到農民肩上。而公社則相反的，在他一個最初的宣言上面就聲稱，戰爭的重負，應當由它的真正罪人來擔當。公社要解放農民的『血租』，給他以廉價的政府，用公社自己選舉出來而且對公社負責的、僱傭的公社官吏去代替那些吸血鬼，如公證人、律師與法官之流。公社還要給他們除去鄉警、憲兵與公所專橫；公社還要用啓發他們的學校教師去代替那些麻木他們頭腦的牧師。法蘭西的農民，首先是會打算盤的，他會覺得，如果付給牧師的錢，不是由收稅者來徵取，而是依照教區內人民信教的程度自動捐助，那末這將是非常合理的吧。這就是公社的統治（只有公社的統治）所能直接給於法蘭西農民的重大利益。所以在這裏用不着再多講只有公社才能夠（而且應當）爲了農民利益去解決的那些更複雜與切實的問題了。這些問題：例如像惡魔一樣籠罩在農民土地上的抵押債款問題，關於日益增加的鄉村無產階級的問題，關於因新式農村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競爭而日漸加速的農民本身的剝奪的問題。

拿破倫第三是被法蘭西農民選舉爲共和國的大總統的，而「秩序黨」（註）却組織了第二帝國。在一八四九年，法蘭西的農民，到處拿他們的首長去與政府的地方官對立，拿他的學校教師去與政府的教士對立，拿他自己去與政府的憲兵對立，這已經開始表示出他實際上所需要的是些什麼。一八五〇年正月二月內由「秩序黨」頒佈的反動法律，據他們自己承認，是反對農民的。農民原是拿破倫的信徒，因爲他把法蘭西大革命和這一革命所給與他的利益，與拿破倫的名氏等同起來了。這種自欺，在第二帝國之下，很快的消失了。過去的成見（在實質上農民是仇視地主的），難道能夠抵抗適合於農民切身利益與急迫需要的公社之號召嗎？

地主們很知道（這是他們所最害怕的），如果公社的巴黎能同外面各省自由傳達消息，那末只要三個月，就會引起全體農民的起義。所以他們如此懦弱地急於用警察來封鎖巴黎，以阻止傳染病的散佈。

（註）秩序黨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團集了保皇黨的大資產階級與地主。



公社實是法蘭西社會中一切健全分子的真正代表，所以它是真正國家的政府。但是，又因為他是工人的政府，勞動解放的勇敢的先驅者，所以它又是十足的國際性的。在歸併法蘭西兩省（亞爾薩斯與勞倫兩省。——譯者註）於德意志的普魯士軍隊的面前，公社却使全世界的工人歸於法蘭西方面。

第二帝國是全世界混蛋的快樂節。各國的強盜聞它的號召都爭先恐後的趕來，希圖在其歡宴中，在對於法國民衆的剝削界分嘗一杯羹。就是在現在，梯亥爾的右手還是華拉興地方的騙子蓋尼思科（Gonesco），左手是俄國的偵探馬爾科夫斯基（Markowski）。公社給與一切外國人以爲着不朽事業而犧牲的那種光榮。在國外戰爭（因資產階級的叛變而失敗的）與國內戰爭（因它同外來征服者同施陰謀而引起的）的中間，資產階級在全法國組織警察去殘害德國人，以此來表現它的愛國主義。而公社却委任了德國工人充當勞動部長。梯亥爾、資產階級、第二帝國，都用他們對於波蘭人深表同情的大聲叫喊，來經常欺騙波蘭人，實際上他們是出賣波蘭人給俄國，實行俄國的骯髒事情。公社尊重英勇

的波蘭子弟，使他們充當巴黎守護者的領袖。爲着顯豁地劃出公社所自覺地開闢的歷史新紀元，公社在普魯士勝利者以及拿破倫軍官所統率的拿破倫軍隊的眼前，推倒了戰爭光榮之偉大象徵——凡登大柱。

公社偉大的社會設施，就是它自身的存在及其工作。它所採取的各別辦法，只能表示出民衆自己管理自己的發展方向。這類各別辦法如：禁止麵包工人夜工，禁止用種種藉口處罰工人以減低工資（這是一身兼有立法、行政與司法權力的僱主的經常方法，他們把得來的罰金放到自己的腰包中），違者重罰。同類的辦法還有：將在逃廠主或停工的一切工廠與作坊交給工人合作社，但廠主還有獲得報酬的權利。

公社的財政上的設施是很機智與穩健的。它不得不限於適合城市被圍情形的那種設施。在郝斯曼（Hausmann）治理巴黎時，（註）銀行公司與建築公司的主人，不知道盜

（註）在第二帝國時代，郝斯曼男爵是森縣——即巴黎城——底知事。他進行了許多新的街道與建築

竊了多少錢，當然公社沒收他們財產的權利，比較拿破倫第三沒收奧利恩（Orleans）皇宮財產的權利要大的多。何享佐龍皇室與英國的寡頭統治者（他們的財產大部分都是剝奪教堂財產來的）當然是對公社大發雷霆，因為公社從沒收教會財產上面所得的數目還不過八千法郎。

凡爾賽政府在它神思略為恢復，力量略為鞏固之後，便即用最野蠻的辦法，去反對公社。它鎮壓全法國一切言論自由，禁止大城市內的代表會議，在凡爾賽與全法國，遍佈偵探，較第二帝國時代有過之無不及。它的憲兵檢查員，焚毀一切在巴黎出版的報紙，拆着一切寄自巴黎與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國民會議中，稍想說一句袒護巴黎的話，即被狂吠壓倒下去，這種情形，就是在一八一六年地主議會中也是沒有的。凡爾賽人不但對巴黎進行喋血的戰爭，而且還利用收買與陰謀，鑽到巴黎去。在這種情形之下，公社如不欲恥辱地叛賣自己的名，那末它怎能像在非常太平的時代那樣保持自由主義的儀式和樣子呢？如若公社政府是同梯亥爾政府一樣，那就沒有理由在巴黎禁止『秩序黨』的報紙，在凡爾賽禁止

公社的報紙了。

自然，當『地主會議』的代表們宣佈挽救法國的唯一辦法，是使法國重新回到教堂懷抱中去的時候，不信上帝的公社，却發現了畢格普斯 (Picpus) 道院與聖拉倫特 (St. Laurent) 教堂的秘密，(註)這真使他們這些代表們發怒了。梯亥爾把榮譽勳章賞給拿破倫的將軍們，因為他們善於打敗仗，善於簽降書，善於在威廉姆·斯海捲香煙；可是，巴黎公社却把稍有不盡職嫌疑的軍官，即刻撤職與逮捕了，這對於梯亥爾不是一種譏刺嗎？公社撤消了並逮捕了那個在里昂曾因破產而受過七天監禁以後又用假名混進公社的公社社員之一，這事對於約爾·法佛勒 (這位偽文件的製造者，法蘭西的外交總長，將法國出賣給俾斯麥並向無可比擬的比利時政府發號施令) 不是有意的侮辱嗎？但公社並不像一切舊政府那樣，自以為毫無錯誤，公社公佈了一切會議上的演詞，公佈它們一切行動；它

(註)在聖拉倫特教堂中，發見了一具被教士所強姦而活埋於墓穴中的女人骨骸。在畢格普斯道院中，藉口說她們是癡狂，把婦女禁閉起來，她們也陷於同樣的命運。

將自己一切缺點告訴給民衆。

在一切革命中，除了其真正代表以外還有另一種人。例如：一方面有些人曾在以前的革命中起過絕大的作用，同它們一起長大起來，因而不懂得現代運動的意義。可是，雖然如此，這些人由於自己的毅力、個人的特性或是由於簡單的傳統，還能對民衆有很大的影響；他方面還有些簡單的清談家，他們一年又一年的重複自己反對現存政府的、刻板的宣言，因而得到頭等革命者的名義。這種人在三月十八日之後也出現了。他們盡力之所及起了頭等作用，去阻止真正的工人階級的運動，正像從前他們這樣的人阻礙一切早先革命之充分發展一樣。他們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惡事，只有經過一定時間才能脫離他們，可是這種時間公社却是沒有。

公社好似用了奇蹟，改造了巴黎。第二帝國的放蕩的巴黎，現在毫無痕跡的消失了。法國的首都，不再是英吉利大地主、愛爾蘭旅外的大地主、(註)美利堅以前的奴隸主與放浪

(註)愛爾蘭旅外的大地主，指那些把他們底收入，浪費於外國而幾乎沒有到他們田莊來過的愛

爾蘭地土。

編輯部註

者，俄羅斯以前的農奴主與華爾興貴族等等的集合場了；在暴屍場上，一個屍首也沒有了；夜中盜劫也沒有了，差不多沒有過一次偷竊。自一八四八年起，巴黎街道第一次變成平安的了，雖然在街上簡直連一個警察也沒有。一個公社的委員說，『我們已不聽到殺害、搶劫及反對個人的犯罪了；看來似乎警察已把他們所有的保守的朋友都隨身帶到凡爾賽去了一樣。』妖媚的女人，已跟了他們的保護者，那些擁有家庭、宗教，尤其是私產的逃亡者一起走了。代替她們的是真正的巴黎婦女，她們勇敢、大度並富於犧牲精神，正如古代的婦人。勞動的、思想的、鬥爭的與流血的巴黎，輝耀着對於自己歷史創造的熱誠的自覺，它完全致力於新社會的建設而差不多忘記了站在它城牆之外的吃人者。

同這巴黎的新世界對立的是凡爾賽的舊世界，這是一切陳腐制度的廢物（渴望撕食民衆屍體的合法派人與奧利恩派人）的集團，它還帶上國民會議中擁護奴隸主暴動的那些共和黨人所組成的尾巴；這些共和黨人，希望因為立於統治首位的老庸醫之虛榮，

而能夠保持他們的國會制度共和國，他們在約·特·伯姆 (Jeu de Paume) 球場 (註) 開他們的祕密會議來滑稽地模倣一七八九年 (法國大革命那年——譯者) 這個集團 (代表法蘭西一切腐朽東西的一具死屍) 之所以還繼續過着幽靈般的生活，只是因為有拿破倫派將軍的刺刀來作爲他們的支柱。巴黎全是真理。凡爾賽全是胡說。這胡說的高唱者，就是梯亥爾。

梯亥爾對賽納與烏哀斯 (Seine-et-Oise) 省的市長代表團這樣的說道：『你們可以相信我的話，我從沒有食言過。』關於國民會議，他說：『它是法國從來所有議會中最自由主義的，最自由選舉出來的一個。』關於他的龐雜部隊，他說：『它是世界的奇蹟。』法國從所未有的『最好的軍隊。』他對各省的人說，轟擊巴黎，這是無稽之說：『如若落進了幾個砲彈，那末這也不是凡爾賽軍隊放的，而是暴動者放的，因爲他們要表示出他們是在戰

(註)這是網球場之名。一七八九年，國民會議在這個網球場中宣誓說：在未把憲法完成之前，即使國王下令，國民會議也不解散。

鬥着，而其實他們是不敢稍一露面的。」後來他又向各省宣告道：『凡爾賽的砲隊並沒有轟炸巴黎，只是將大砲向巴黎射擊而已。』他向巴黎的主教說，人家罵凡爾賽人實行了槍殺與壓迫辦法，這一切全是謠言。他向巴黎聲稱，他『只不過要把巴黎從壓迫它的可惡的魔王手裏解放出來，』公社的巴黎，『只不過是一羣罪犯而已。』

梯亥爾的巴黎，不是『下層百姓』的真正的巴黎；它是虛幻的巴黎，騙子的巴黎，男女遊蕩者的巴黎，有錢人的、資本家的、塗金者的、遊手漢的巴黎；這巴黎，現在將它的奴僕、騙子、蕩婦、文丐充滿了凡爾賽、聖地尼（Saint-Denis）、呂哀爾（Rueil）與聖茹門（Saint-Germain）。這巴黎把內部混戰只當做有趣的消遣品，它從望遠鏡裏觀看戰鬥，計算放砲次數，並且用它自己及它娼婦的名譽來宣誓說：這裏的表演，比較聖馬丁（St. Martin）戲院中的表演還要好的多。死者真是死去，傷者的呼聲也不是假造的，這種在他們面前演着的戲劇，真是世界歷史的戲劇。

這就是梯亥爾的巴黎，正好像柯布倫茨的逃亡，是台卡龍（De Calonne）的法蘭西



一般。(註)

#### 四

奴隸主第一次企圖用普魯士軍隊佔據巴黎的謀陰，因俾斯麥的拒絕而失敗了。三月十八日第二次圖謀的結果，是軍隊失敗，政府以及全部行政機關逃亡到凡爾賽。梯亥爾假裝同巴黎進行和平談判，爭取時間準備作戰，但他從那裏取得軍隊呢？戰鬥部隊的殘餘，人數既少，又不大可靠，他發給各省的催促國民軍與志願軍快來幫助凡爾賽的宣言，又得到了公開的拒絕。只有不列登派遺了一些『凶徒』(Chouans)這些人，胸上帶着白布的耶穌的心，在白旗下面進行戰鬥，他們戰鬥的呼號是『國王萬歲！』這樣，梯亥爾只能匆匆忙忙的集合一些水手、海軍、教主的武士、瓦倫頓的衛兵、皮脫里(Pietri)的警察與偵探等等的龐雜隊伍，假使沒有逐漸到來的被俘的拿破倫軍隊，那末梯亥爾的軍隊真是稀少得可笑。

(註) 柯布倫茨是法國大革命時代反革命貴族逃亡的中心地。台卡龍是一七八九年革命前夜的法國的宰相。

（俾斯麥放回這樣數量的法國俘虜，使得一方面他們能夠進行國內戰爭，他方面，凡爾賽不能不對普魯士處於奴隸般的依靠的地位。）凡爾賽的警察，在戰爭時應當監視凡爾賽的軍隊，而憲兵却應當常常帶着這軍隊，把他們送到最險要的地點上去。陷落的砲台，不是奪得的，而是購買得的。公社社員的英勇告訴了梯亥爾，要克服巴黎的抵抗，他的戰略天才既不夠，他所統帶的軍隊的數量也不夠。

同時，他同各省的關係一天一天變成更其不好了。凡爾賽沒有接到一封同情信，能夠稍為鼓勵梯亥爾及「地主」們的勇氣。相反的，來自各地的代表與聲請書，都以不大尊敬的口氣，要求凡爾賽在無條件的承認共和國、確認公社的自由、解散已經滿期的國民會議之基礎上去同巴黎議和。代表與聲請書，是如此之多，使得梯亥爾的司法總長杜福爾，不能不在四月二十二日通令上命令國家檢察官把「主張議和的宣言」看成罪案。梯亥爾看到進攻巴黎沒有希望，於是決定改變策略，指定在四月三十日，根據他指令國民會議通過的新法律，舉行全國市政府的改選。他利用他的地方官的陰謀或他的警察的恐嚇，相信各

省的選舉，必定會給國民會議以向所未有的權威，他更希望各省能給他以征服巴黎的物質力量。

除他的反對巴黎的強盜戰爭（爲他自己公報上所讚美的）與他的總長們把恐怖滿佈於全法國的企圖以外，他更決定用小小的議和的滑稽劇來作補充。這滑稽劇應當有幾種作用，它應當欺騙各省區，吸引巴黎中等階級到他這方面來，而最主要的，却是在於使國民會議中的假共和黨人有可能用他們對於梯亥爾的信仰，來掩蓋他們對於巴黎的叛變。三月二十一日當梯亥爾還沒有軍隊時，他在國民會議中說道：『不論怎樣，我總不派軍隊到巴黎。』三月二十七日，他揚言『我就職於共和國已經成爲既成事實之時，我堅決的保護它。』實際上他利用共和國的名義，鎮壓了里昂與馬賽的革命，（註）他的『地主』們，一

（註）在里昂，革命之爆發與公社之宣佈是發生於三月二十二日，在馬賽是發生於三月二十三日，他們

都迅速地被梯亥爾政府鎮壓下去了。在都魯士（Toulouse）那滂（Narbonne）與其他幾個城市，也會宣

佈成立公社。

——編輯部註

聽到『共和國』三字，就用狂叫將它壓倒下去。此後，他又把既成的事實認作是假定的事實。從前他所謹慎地從卜都遺散出去的奧利恩王子們，現在又在特里安（Trianon）搗亂，公開破壞法律。梯亥爾在其對於巴黎人與各省代表的無數會議上所提出的條件，雖然口氣色彩很多變換，但結果總不外乎必須『處罰那些殺死克萊孟梭與萊康德的一批犯罪者。』當然，這上面還加上一個不言自明的條件，即巴黎與法蘭西要承認梯亥爾自己為最好的共和國，正像三十年代梯亥爾承認路易斐立伯為那時最好的共和國一樣。但是就是這些條件，根據他的總長們在國民會議上的官場的解釋，還是可以懷疑的。他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還經過杜福爾去行動。舊日奧利恩朝的律師杜福爾，在被圍情況之下，常常起了高等法官的作用。在現在一八七一年梯亥爾治下如此，在一八三九年路易斐立伯治下如此，在一八四九年拿破倫第三治下亦如此。當他不是總長時，他擁護巴黎的資本家，攻擊他自己所頒佈的法律因而發了財，並且得到了政治家的稱號。他不滿足於國民會議中所通過的許多壓迫的法律（這些法律，在巴黎陷落之後可以用來消滅共和國自由的最後的

殘餘）他預想巴黎將來命運而採取以下辦法：在他看來軍事法庭法的審判程序還是太慢，他把這種程序縮短而頒佈了新的殘酷的充軍法。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消滅了對於政治犯的死刑而拿充軍來代替它。就是拿破倫第三也至少不敢公開的恢復斷頭台。凡爾賽的地主會議，還不敢說巴黎人不是起義者而是強盜，它於是不得不限於用杜福爾的充軍法來反對巴黎。在這種情況之下，梯亥爾當然不能很久的延長他的議和的滑稽劇，因為這一滑稽劇引起了地主們瘋狂的反對（實際上這正是他所希望的），而這些人，因為他們愚蠢，既不能了解他的把戲，又不能了解他的虛偽做作與遲延的必要。

看到四月三十日市政府選舉快要到來，梯亥爾便於四月二十九日做了一次他的議和的把戲。在他所作的許多感情講話的中間，他曾從國民會議的講壇上說了這樣的話：『反對共和國的，只有一個陰謀，巴黎的陰謀。這陰謀使我們不能不流法蘭西的血。我現在再重複的說：讓那些舉起武器的人放下他們瀆神的武器吧，那我們就會放下正義的劍來訂立和平條約，被除外的，只是一小部分罪犯而已。』在答覆打斷他講話的地主怒喊時他說

道：『先生們，敬請你們告訴我，難道我所說的話不對嗎？難道你們因為我說了罪犯不過是一小部分人的公道話，而真的不好過嗎？流萊康德與克萊孟湯姆將軍的血的人，只是些例外，難道這點你們不以為是我們不幸中之幸嗎？』

但是，法蘭西對於梯亥爾自以為具有妖婦歌唱的魅惑之力的演說，還是置若罔聞。在三萬五千個公社所選舉出來的七十萬個市政府議員中，合法派、奧利恩派與拿破倫派合併起來還將不到八千人。補充選舉與複選的結果，更表示對於梯亥爾政府的敵意。國民會議不但得不到它所必需的各省的物質幫助，而且還失去了他自己要求威望的最後的權利，即成爲全法國普選制的表現的權利。爲完成這個失敗起見，全法國城市中所選舉出來的市政府議員們，自己在卜都召集議會來威嚇僭竊權位的凡爾賽議會。

爲俾斯麥所久候的盡力干涉的時期，現在是到來了。他拿着發號施令者的口氣，命令梯亥爾立刻派全權代表到法朗克府，去最後訂立和平條約。梯亥爾自然卑怯地唯命是聽地趕快執行了他的主人，他的上司的意志，把他的忠實的朋友約爾·法佛勒與波野爾·

克爾底爾派到法朗克府去。波野爾·克爾底爾是路安地方紡織廠的『著名的』廠主是第二帝國的熱烈的甚至曲意奉迎的擁護者。在他看來，第二帝國除了那妨害他廠主利益的英法商約（註）之外，毫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當梯亥爾在下都任命他爲財政總長之時，他開始對這『不幸的』條約實行攻擊，以爲這條約不久即須消滅。他甚至無恥到了這種地步，竟想重新採用舊的反對亞爾薩斯的保護稅制（雖然因爲沒有得到俾斯麥的允許，未能成功）。據他自己說，這在當時是沒有任何國際條約來加以阻止的。這人把反革命看作是減低路安地方工資的工具，把對於各省區讓步看作是提高他自己商品在法國價格的工具，這人的確是約爾·法佛勒在他最後的終結其全部事業的賣國行動中最適當的同道者。

當這絕妙一對全權代表到了法朗克府之時，俾斯麥便以軍人氣概命令道：『或者恢

（註）拿破倫第三在一八六〇年與英國所締訂的商約，減低了對於英國貨物的進口稅。

復第二帝國，或是無條件的接受我的和平條件！』他的條件，就是在於軍事賠款，償付期應予縮短，並且在俾斯麥以爲法國情形還不能令他滿意之時，普魯士軍隊應予佔據巴黎砲台。這樣，普魯士就被認爲是法蘭西內政的最高法官，而俾斯麥方面，則表示完全準備好釋放被俘虜的拿破倫軍隊來消滅巴黎，並且在必要時，還可以用威廉皇帝的軍隊去幫助他。爲了保證他決不食言起見，他將第一部分賠款的支付期延長到巴黎『平定』之後。梯亥爾及其全權代表，當然急忙地吞下了這種釣餌。五月十日，他們簽訂了條約，五月二十一日，由於他們的努力，條約已爲國民會議批准了。

從訂定條約到被俘的拿破倫軍隊回國的這期間，梯亥爾覺得比平日更有繼續他的『議和』滑稽劇的必要。尤其必要的，是因爲他的共和主義的走卒們，非常需要適當的藉口，使得他們能夠從手指的間隙中去觀看對於巴黎的血腥屠殺的準備。五月八日，他在回答那些主張調停的中等階級代表們時，還說道：『只要暴動者答應投降，那巴黎的城門就可以洞開一星期，讓大家（除殺死萊康德與克萊孟湯姆兩將軍的兇手以外）進出。』



幾天之後，當『地主們』要求他對這種允諾作一解釋的時候，他竟置而不答，但是却很有深意地說道：『對你們說吧，在你們的中間，有很多沒有耐心的人，他們太過於性急了。請他們再等一星期吧，一星期之後什麼危險也沒有了，任務將看他們的勇氣與能力來解決。』當馬克馬洪（Mac Mahon）答應他說不久即可進入巴黎之時，他即在國民會議中聲明道：他將『拿着法律走進巴黎，強制那些流兵士之血，破壞公共紀念碑的混蛋清償他們的罪惡。』當決勝的一分鐘到來時，他對國民會議聲明道，他對巴黎『決不留情。』巴黎的罪名已被判定，至於拿破倫派的強盜們，那末政府是答應他們任意去向巴黎報仇的。最後，當叛賊於五月二十一日給杜哀（Duval）將軍打開了巴黎的城門之後，梯亥爾就於五月二十二日爲『地主們』揭開了他們所死，不懂得的議和把戲的『目的。』幾天以前我對你們說過，我們接近着我們的目的了；今天我來對你們說，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目的。秩序、正義與文明，最後得到了勝利！』

對呵！這的確是勝利。當資產階級制度下的奴隸們舉行正義反對他們主人時，這種制

度的文明與正義，方在真正的充滿罪惡的色彩中表露出來了。那時，這一文明這一正義正是赤裸裸地野蠻的與非法的復仇。財富生產者與財富享受者的階級鬥爭中的每一新的危機，都更明顯的表示出了這一事實。與一八七一年空前的罪惡相較，甚至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的暴行也相形見拙了。在凡爾賽人攻入城內以後，全部巴黎人民——男的、女的與小孩子——還整星期的以自我犧牲的英勇精神進行戰鬥，這種英勇精神，反映出他們事業的偉大，正像兵痞的野獸行動反映出爲他們所保護，由他們來報復的那種文明的全部精神一樣的明顯。在戰爭之後，還是大批殺戮，結果，使得如何處理大堆死屍的事情成爲困難的問題，這樣的文明，真是偉大的文明啊！

如要找到近似梯亥爾與其劊子手們行動的例子，那就必須回頭到蘇拉與兩個羅馬得勝者的時代去。同樣的不動聲色的大批殺人，同樣的劊子手對於犧牲者的年齡與性別絲毫不顧；同樣的毒打被囚者；同樣的流徙，不過這一次是反對整個階級罷了；同樣野蠻地搜尋隱藏起的領袖，使他們沒有一個能存留下來；同樣的把政治的與私人的仇敵告密，同

樣殘忍地屠殺那些完全沒有參加鬥爭的人們。所不同的，只是羅馬人沒有機關槍來整批的槍斃囚徒，他們沒有『手執法律』口說『文明』那樣罷了。

除了那些獸行之外，再來看一下資產階級自己報紙所描寫出來的資產階級文明的更可恥的另一方面吧。

一個倫敦的保守派報紙的巴黎通訊員寫道：『遠地裏還響着槍聲，受傷的人無人照顧，聽其死於俾爾·拉希斯的墓石中間；六千個暴動者正在死亡前絕望地徘徊着，他們却迷路在曲折莫辨的墓穴之間；街道上窮追着不幸者，爲得要用機關槍來把他們殺死。在這個時候，看到各種各樣的老爺先生們在咖啡館內作樂，飲着酒，打彈子，玩骨牌，妖冶的婦人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再在夜深人者之際，聽到從富麗的酒館的小房間中發出歡樂的叫聲，這真不免令人氣憤。』愛德華·愛爾維 (Edward Helve) 先生在巴黎報 (曾爲公社封閉的凡爾賽的報紙) 上寫道：『巴黎的居民(一)昨晚表現他們歡樂的方式，實不只是輕佻而已，我怕這樣下去，一定還要更壞。如果我們不願得到『墮落時代的巴黎人』的稱號，那

末，這種歡樂情形，是完全要不得的。」於是，他引用了泰采脫（Tacitus）的語句：『看呵，在這個可怕鬥爭的第二天早晨，甚至更早些，在鬥爭還沒完全終結以前，墮落的、腐敗的羅馬，又跌落到放蕩的沼澤中去了。這種放蕩毀壞了他的肉體，弄污了他的靈魂——這兒是鬥爭與創傷，那兒是餐館與澡堂。』不過愛爾維先生忘記了他所說的『巴黎居民』是從凡爾賽、聖地尼、羅威爾與聖日耳曼大批奔回的梯亥爾的巴黎居民，騙子的巴黎居民而已；這真是『墮落時代的巴黎』。

這個根據於勞動奴役之上的可恥的文明，在每一次血腥勝利中，用那種回響於全世界的污穢與毀謗的狂呼，去掩沒爲新的更好社會而奮鬥而犧牲的戰士的喊聲。公社時代快樂的工人的巴黎，在那些守衛『秩序』的血腥走狗的手下，突然變爲地獄了。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對於這種奇怪的變化作如何的評判呢？他們只是說，公社對於文明圖謀不軌！巴黎的民衆，爲了公社視死如歸，自古以來沒有一次戰鬥死了這麼多的人。這是什麼意思？只是說公社不是民衆的政府，而是一小羣罪人用暴力奪來的政權！巴黎的婦人很高興地死

於巷戰中，死於刑場上。這是什麼意思？只是說公社的魔鬼把她們變成了馬格爾（Mageras）（註）與海加脫（Hecates）！在公社完全統治的整個兩個月內公社的溫和，只能與它保護自己的那種英勇毅力相比擬。這是什麼意思？只是說，公社在兩個月內只用它的溫和與人道來遮蓋它的惡魔般的對於血的渴望，使之能在臨死的痛苦中自由地發洩出來！

巴黎的工人，在他們英勇的自我犧牲中，使火延燒了房屋與紀念碑。當無產階級的奴役者一塊一塊地撕碎無產階級的肢體時，他們休想得意洋洋的回到他們完好的住宅中去。凡爾賽政府大喊『放火！』並輕輕地告訴他的奴僕（一直到窮鄉僻壤）以這類的口號：『搜殺我們的一切敵人，把他們當作簡單的放火者。』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很快樂的看著戰鬥之後大批人們的被殺，但當私人住宅被『弄髒』時，他們就勃然大怒了！

當政府正式核准海軍去『格殺焚燒破壞』之時，這是不是核准放火？當英國的軍隊竟焚毀華盛頓的議院，焚毀中國皇帝的夏宮時，那是不是放火？當普魯士人不是爲着軍事原

（註）馬格爾，據古希臘神話，是復仇女神之一。一般的是指强悍的女人。

因而是單純由於惡意報復的念頭，遍洒洋油（如在夏多頓）燒燬城市與許多村莊，這不是放火？當梯亥爾在六個星期內砲轟巴黎而聲說這僅僅是爲着破壞那些有人居住的房屋之時，這是不是放火？在戰爭中間，火是完全合法的武器。向敵人佔據的房屋轟擊，是爲得燒燬它。當守禦者不得不退出房屋時，他們就自動的燒燬它，使進攻者不能在房屋中鞏固起來。妨礙任何常備軍行動的一切房子，要遭遇不可避免的命運——被焚燬，可是在奴隸反抗壓迫者的戰爭中，這種行動却被看做是犯罪！公社完全把火當做防禦（嚴格的意義）的工具；它利用火是爲了不使凡爾賽的軍隊進到那直長的街道上（這類街道是奧斯曼有意爲了便於砲擊而建設的）；它用火是爲掩護它自己的退却，正像凡爾賽人進攻時利用他們的炸彈一樣，這種炸彈所破壞的房屋並不比公社的火所焚毀的爲少。一直到現在，還不清楚到底那些房子是進攻者焚毀的，那些是守禦者焚毀的。而且，防守者只到凡爾賽軍隊開始大批槍殺俘虜之時，才着手用火。關於這一點，公社老早就聲明，如果公社被逼到了極端，那他就要在巴黎廢墟之下埋葬自己，使巴黎變爲第二個莫斯科。這種預言，從前國

防政府也曾說過，當然，它不過是用來作爲掩蓋自己叛變的假面具而已。爲了這一點，脫羅秀曾經預備了很多的洋油。公社知道，它的敵人毫不顧惜巴黎人民的生命，可是對於他們在巴黎的住宅，却非常重視。而梯亥爾則宣稱他將實行殘酷的復仇行動。當一方面他的軍隊已經準備好作戰，他方面普魯士軍已經封鎖了一切出口之所，他就高叫：『我將是無情的！贖罪需要高價，審判須要嚴厲！』如若巴黎工人的行動如像凡達爾人（註）一樣，那這將是決死防禦的凡達爾主義而不是勝利者的凡達爾主義，有如破壞上古時代真正可貴的美術紀念物之基督教徒凡達爾主義那樣。不過就是後一種凡達爾主義，歷史也以爲是可以原諒的，因爲這是在新興的社會同沒落的社會作偉大的鬥爭時必不可免的而且比較不大重要的隨從物。至於公社的行動，同那種爲着給佚樂者肅清道路而破壞歷史的巴黎之那種奧斯曼凡達爾主義相較，那更是不相像了。

（註）凡達爾人是德意志人之一種，在五世紀初期，侵入西班牙，佔領其南部；四二九年侵佔羅馬所屬的

非洲；四五五年，劫掠了羅馬。凡達爾人作了許多粗暴破壞的行動。

——譯者註

那末公社殺死六十四個抵押者（其中有巴黎的大主教），這又是怎樣一回事呢？一八四八年六月，資產階級及其軍隊重新恢復了早已絕滅的槍殺無抵抗底俘虜的軍事習慣。以後，這種野蠻的習慣，在歐洲與印度，鎮壓一切民衆起義之際，就多少被經常採用了。這顯然證明，此種習慣確是真正的『文明的進步』！此外普魯士人在法國重新採取了扣留抵押者的習慣，要使那些毫無罪名的人，以自己性命去爲他人的行動負責。像我們所知道的，當梯亥爾在戰爭開始就採取槍殺被俘公社人員的人道主義習慣時，公社除了使用普魯士人所採取的扣留抵押者的習慣以外，再沒有其他的方法來拯救那些被俘者的生命。凡爾賽人之繼續槍殺俘虜，實際上就是把他們抵押者處死。在馬克馬洪的侍衛以如此血腥的屠殺來慶祝他們進入巴黎之時，這些人的命又怎能再被饒赦呢？難道對於不顧一切實施暴行的資產階級之最後防禦手段——扣留抵押者——只是開玩笑嗎？達爾波主教的真正兇手是梯亥爾。公社曾經不止一次提議將大主教與其他許多牧師來同勃朗基交換，可是梯亥爾却緊緊的拿住他不肯放手。梯亥爾對於這種交換堅決的拒絕了。他知道放



了勃朗基是使公社有了首腦，而大主教的死尸較之活的大主教對於他更有用處。在這場合上，梯亥爾是仿效加文尼亞克（Cayaignac）的。加文尼亞克同他的『秩序保護者』於一八四八年六月，是如何暴怒地責備暴動者殺死大主教阿富爾（Alfre）啊！實際上，他們很知道，殺死大主教的，是『秩序黨』的兵士！親見此事的大主教手下的一位總牧師若克梅，於事情發生之後就立刻公開證明了這點。

『秩序黨』在自己一切屠殺的血宴之後，總是散播了許多關於自己犧牲者的謠言，這只是證明出，我們的資產階級認為自己是古代封建諸侯的合法承繼者，這些諸侯承認自己已使用一切武器來反對平民之權，可是當平民使用任何武器之時，則他們就以爲是罪惡了。

統治階級利用國內戰爭的幫助與外國征服者的保護來鎮壓革命底那個陰謀（對這一陰謀，我們已從九月四日起一直看到馬克馬洪的侍衛進入聖哥羅門爲止），是以巴黎的大屠殺爲其終結的。俾斯麥很自滿地看着巴黎的廢墟，並且大致還以爲這是一切大

城市總破壞的『第一步』，因為當他還只是一個簡單的地主，還只是一八四九年的普魯士『無雙議會』的議員時，他就喜歡夢想這一點。他很自滿地喜歡着巴黎無產階級的死屍。在他看來，這不但是革命的絕滅，而且也是法蘭西的消滅，這法蘭西現在已經沒有了首腦，而這首腦的取消正是法蘭西政府自己幹的。他的膚淺，正像其他一切榮貴的政治家一樣，他只看到這件偉大歷史事件的外表。難道你們在過去的歷史上，曾經看到過征服者能夠利用被征服的政府來作警察與僱用兇手以完成自己勝利的例子嗎？普魯士與公社中間，沒有發生過戰爭。相反的，公社曾答應和平的初步條件，普魯士也宣佈了中立。這樣說來，普魯士不是交戰的一方面。可是普魯士的行動，却正如一個懦怯的兇手，因為它作了那種對他沒有任何危險的兇事；又正如一個僱用的兇手，因為他預約好在巴黎陷落時，給他以五萬萬法郎的兇殺的代價。看呵，這就是上蒼用十分道德的相信天神的德意志的手來懲罰無神的、放蕩的法蘭西之戰爭的真相！這就是從舊世界法律家的觀點看來也是對於國際法的空前的違犯。可是這種違犯，却沒有迫使歐洲的『文明』政府起來宣佈那個爲彼得

堡內閣手內簡單工具的罪惡的普魯士政府是個犯法者；而却僅僅給了它們（指那些『文明政府』）以討論如下問題的口實，就是：他們不應當把那些從巴黎雙重包圍中脫逃出來的不多幾個的戰爭犧牲者移交給凡爾賽的劊子手？

在新時代最可怕的戰爭之後，戰勝者與失敗者的軍隊聯合起來，來共同殘殺無產階級。這樣的空前事件，並不是像俾斯麥所想的，證明那個正為自己開闢道路的新社會已經最後的失敗，而只是證明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已經完全腐化。舊世界所尚能做的最大的英勇事業，是民族的戰爭，可是現在看來，這也不過是政府的純粹欺騙的勾當，其目的只是在於延緩階級鬥爭；只要階級鬥爭一爆發為國內戰爭的大火，這種戰爭便被拋置一傍了。階級的統治已經不能拿民族的外套來掩蓋了；在反對無產階級時，許多民族的政府是一起的。

在一八七一年的白色星期日之後，法蘭西的工人與他們勞動生產品的享受者之間，已經不能有和平，不能有調解了。雖是僱用軍隊的鐵腕一時能把這兩個階級平靜下去，然

而它們的鬥爭必要重新爆發，而且還要更厲害的展開起來。至於最後，誰是勝利者：是少數的享受者，還是最大多數的勞動羣衆？這一問題，是不能有什麼懷疑的。法蘭西的工人，不過是整個現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罷了。

在對於巴黎的鎮壓上面，歐洲各國的政府事實上表現了階級統治的國際性，可是它們同時又向全世界高喊，這次不幸的主要原因是在於國際工人聯合會，即在於反對全世界資本陰謀的國際勞動的組織。梯亥爾責罵這組織，說它是勞動的專制魔王，而說他自己是勞動的解放者。畢加爾則禁止國際的法國會員與其他國外的會員發生任何關係。已成木乃伊的老頭兒蕭培爾公爵，曾是梯亥爾在一八三五年的舊同事，他聲稱每個政府應該以消滅國際爲自己的主要任務。地主們，國民議會的代表們，狂吼似的來反對國際，而歐洲的新聞界則一致加以附和。一個可敬的法國的作家，一個同我們國際工人聯合會沒有絲毫共同之點的人，關於國際，這樣說道：『國民軍中央委員會委員與公社的大部分社員，都是國際工人聯合會最活動、最清楚、最努力的首領……這是些完全忠實的、誠懇的、聰明的、』

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純潔的而且狂熱（照字的好的意思講）的人。』充滿警察精神的資產階級的陳見，當然把國際工人聯合會看做是一種秘密的陰謀的結社，說它的中央管理局時時指定在各國舉行暴動。可是，實際上，我們的國際工人聯合會，不過是聯合文明世界各國先進工人的國際聯合會罷了。不論那裏發生什麼階級鬥爭，不論這鬥爭採何種形式，不論這鬥爭發生於何種條件之下，不論這鬥爭的內容如何，站在鬥爭的前線上的，自然總是我們國際工人聯合會的會員。這聯合會所由產生的基礎，正是現代社會的本身。不論流灑多少鮮血，這聯合會是不能被消滅的。要消滅它，各國政府首先應當消滅資本對於勞動的專制的統治，即首先應當消滅他們自身寄生性的存在的基礎。

★

★

★

★

工人的巴黎與他們的公社將永遠是被敬為新社會光榮的先驅者。它的被難者，將永遠被記在工人階級偉大的心坎之中。它的劊子手，已被歷史釘上了恥辱牌，任何他們牧師的禱告都不能把他們取下來。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倫敦。

## 馬克思致顧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

一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於倫敦。

如果你讀到我底拿破倫第三政變記底最末一章，你就可看見我說了這樣的話：法國革命底下一次的企圖，不再是像從前一樣，把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機器從一手移轉於他手，而是要把它打碎；這是歐洲大陸上每一真正民衆革命底先決條件。（註二）我們英勇

（註一）在這裏所發表的致顧格曼的信中，馬克思對巴黎公社作了估計，認為公社是『有偉大意義的歷史的實驗，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某種前進，較之幾百條綱領和討論尤為重要的一個實踐步驟。』（列寧：國家與革命）

列寧在一九〇七年寫道，馬克思的這封四月十二號的信，是『我們願意看見每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

員與每一個識字的俄國工人都把它懸掛於家中壁上的一封信。」

在這封致顧格曼的信中，馬克思把那些對於馬克思主義國家論非常重要的結論，（這些結論，他是從巴黎公社底世界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得出來的，）陳述得更為正確，更為明瞭，更為優良。（如列寧所說）

「很明顯地，馬克思底四月的信（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表達了與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在五月末（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的宣言中所包含的一樣的思想。

「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稱爲「現成的國家機器」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的信中就稱之爲「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機器」；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用「簡單地奪取」這幾個字所表達的，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的信中，又再陳述得更爲正確，更為明瞭，更為優良：「從一手移轉於他手。」此外法蘭西內戰一書所沒有的一些補充，是特別重要的：不是把現成的「機器」從一手移轉於他手，而是把他打碎。巴黎公社開始是幹這件事，但可惜沒有幹到完成。（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

馬克思在四月十七日致顧格曼的信中，對於羣衆底歷史的創造力估計得很高——列寧對於此點特別重視。列寧把這估計與俄國孟塞維克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估計相對比。他指出馬克思與普列哈諾夫之間對於這個問題是存在着巨大的鴻溝。普列哈諾夫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達到了懦怯的機會主

義的結論說「他們原不應動用武器呵。」

「這位最淵博的思想家（他在六個月之前，就已經預料到失敗）對於羣衆底歷史創造力之尊敬，與無生命的、無靈魂的、迂腐的話——「他們原不應動用武器呵」相較，豈不是有天淵之別嗎？」

「……馬克思善於珍視這樣的事實，就是在歷史中，含有這樣的時機，羣衆甚至爲一個無成功希望的目標而拚命奮鬥，但這爲了給這些羣衆以更進一步的教育，爲了訓練他們準備下一次的鬥爭，還是必要的。」（列寧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文）

正如馬克思從失敗的巴黎公社底經驗，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教訓，以充實他的國家學說一樣，勝利的蘇聯無產階級底更有意義的世界歷史的經驗，在列寧與斯大林之手內，成爲把馬克思對於革命，對於國家與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更進一步地發展之豐富材料。

——編輯部註

（註二）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列寧對於馬克思爲什麼將他的結論限於歐洲大陸作如下的解說：

「這在一八七一年的時候，自然是很明白的，那時英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底模範，而沒有軍國主義，就大體講來，也沒有官僚制度。因此，馬克思便把英國除外，就因爲在當時英國的革命，甚至於民衆的革命，即使沒有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這一個先決條件，也有實現的可能。



「現在是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那個例外，已經不適用了。世界上最大而最後的那兩個無軍國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底代表者——英國和美國——已完全捲入全歐的污穢的血坑中去了。捲入凌駕一切和壓服一切的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制度的血坑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和美國，「一切真正民衆革命的先決條件」便是打碎和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這些國家已經準備了像「歐洲」一樣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機器）。」此外，列寧特別重視馬克思使用「民衆革命」這個概念，並給予如下的解釋：

「在一八七一年，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家內，無產階級都尚未成爲民衆底多數。把真正大多數的民衆捲入運動旋渦中的「民衆」革命，當時只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包括在內才有可能。這兩個階級構成當時的「民衆」。這兩個階級由於受「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機器」底壓迫、踐踏、剝削而聯合起來了。打碎這個機器，破壞這個機器，便是「民衆」的民衆大多數的工人和多數農民之真正利益，便是貧農和無產階級自由聯合底「先決條件」。要是沒有這個聯合，則民主制是不穩固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巴黎公社」雖然由於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達到目的，可是它爲自己開闢了走向這個聯合的道路」（見國家與革命中譯本「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二卷三八一頁）

的巴黎黨的同志們所企圖的，就是如此。這些巴黎人，是有何等的機動能力，何等的歷史的創造力，何等的自我犧牲的能力呵！經過了六個月的飢餓與破壞之後（造成飢餓與破壞的，與其說是國外的敵人，不如說是國內的叛變），他們在普魯士的刺刀下面革命起來，好像法國與德國沒有發生戰爭似的，好像敵人不在巴黎門前似的。在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像這樣偉大的例子。如果他們歸於失敗，那只是由於他們底『寬容的性質』。在最先維諾衣，後來巴黎國民軍底反動部分，都敗退到凡爾賽之後，他們應該立即向凡爾賽進軍。由於良心上的躊躇，他們喪失了時機。他們不願發動國內戰爭，好像那惡毒的妖物梯亥爾還沒有因企圖解除巴黎武裝而把內戰發動起來似的。第二個錯誤：中央委員會爲要讓位給公社，而把權力放棄得太早。這又是由於『太過端正』以至流於疑懼（註三）雖是如此，這一次

（註三）列寧在他的讀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的筆記中，把巴黎公社底錯誤底本質與巴黎公社社員底歷史功績概述於下面幾句話：

「這兩個錯誤，都是在於缺乏進攻，缺乏意識與決心去打碎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機器與資產

階級底權力。巴黎公社裏面，鼓起馬克思熱情的是些什麼呢？這就是巴黎人的機動能力，「歷史創造力，自我犧牲的能力」。『巴黎底翻天覆地的英雄們。』（列寧：馬克思主義論國家）

——編者註

的巴黎起義——即使它被舊社會底狼、豬和惡狗們所壓倒——還是我們黨從巴黎六月起義以來的最光榮的行爲。將這些巴黎底『翻天覆地』的英雄們，與德意志普魯士神聖羅馬帝國（它帶有染着兵營臭味、教堂臭味、士官貴族臭味，尤其是庸人臭味之因襲的假裝）底順天的奴才們比較一下罷。

順便對你說。在正式發表的向拿破倫第三底財政部直接領取津貼的單子中，有一項：一八五九年八月符赫特（Vogel）領取四萬法郎，我已將此事告訴李卜克內西以備將來之用。

## 二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於倫敦）

……你怎樣能把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註四）那一類的小資產階級的示威與巴

(註四)參看馬克思所著法蘭西階級鬥爭第三章。

——編者註

黎的現在的鬥爭來比較，這是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

如果鬥爭只在一定順利的機會底條件之下才去進行，那末，世界歷史就一定是很容易造成的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那世界歷史就一定帶着極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很自然地進入於發展底一般行程中並為其他的『偶然性』所抵償。但是，加速或延緩，（指進程言——譯者）是很依靠於這一類『偶然性』的——（包括這樣的偶然之事，如那些在最初就站在運動之首的人物的性格）。

這次決定的不利的『偶然事體』決不應求之於法國社會底一般條件之中，而應求之於普魯士軍駐在法國與普魯士軍近在巴黎的這種情形之中。這是巴黎人所深知的。這也是凡爾賽的資產階級的棍徒們所深知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要巴黎人在二者之中選擇其一；或是接受挑戰，或是不戰而降。不戰而降，是使工人階級瓦解，其不幸比喪失任何數目的首領還要大得多。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的鬥爭，因巴黎的鬥爭

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管其直接的結果如何，一個有世界歷史重要性的新出發點是已經取得了。

## 列寧在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文中論巴黎公社

……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之評價，是致顧格曼書信集底最精彩的一部分。而這個評價，與俄國右派社會民主黨人的方法相比較，是特別有價值的。普列哈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之後怯懦地喊道：『他們原不該動用武器呵！』而他還有臉孔自比於馬克思。他暗示說，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也阻止了革命的。

是的，馬克思也阻止一八七〇年的革命。但在普列哈諾夫自己所提出的這個比較中，普列哈諾夫與馬克思之間是隔着多麼遠的鴻溝呵！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第一個革命浪潮達到其最高峯之前一個月，普列哈諾夫非但沒有鄭重警告無產階級，而反是明確地說必須『學習使用武器，武裝起來。』可是，一個月之後，鬥爭爆發起來，普列哈諾夫絲毫沒有企圖去分析它底意義，它在事變一般發展中的

作用，它與以前鬥爭形式的關係，而只是急急忙忙扮演着懺悔的知識分子底角色，高喊：『他們原不應動用武器呵！』

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在巴黎公社發生六個月之前，馬克思鄭重地警告法國工人。他在著名的國際底宣言中說，推翻新政府的企圖是絕望的蠢舉。他在事先就揭穿了要發動一個與一七九二年同一精神的運動底這種可能性，是民族主義的幻想。他能夠不是在事後而在幾個月以前，就這樣說：『不要動用武器。』

但當這個無希望的鬥爭（這是他自己在九月所宣稱的）已在一八七一年三月開始實行之時，他採取什麼行動呢？他是否利用這機會（像普列哈諾夫利用十二月事變那樣）去打擊他底敵人——領導巴黎公社的普魯東派與勃朗基派嗎？他是否像一個羞作怒叱的女教員那樣說，『我早已告訴了你們，警告了你們；這就是你們底浪漫主義之結果，就是你們底革命的癡狂之結果』嗎？他是否向巴黎公社社員宣傳着自滿的庸人底說教，像普列哈諾夫向十二月戰士所宣說的那樣，說『你們原不應動用武器』嗎？

沒有。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馬克思寫一封熱烈的信給顧格曼——這是我們願意看見每一個俄國社會民主黨員與每一個識字的俄國工人都把他懸掛於家中壁上的的一封信。

在一八七〇年，馬克思說起義是拚命的蠢舉；但在一八七一年四月，當他看見了人民底羣衆運動，他對於這個在世界歷史革命運動中表示前進一步的大事變，是像一個參加者那樣，以重大的注意來觀察它。

他說，這是要把官僚主義的軍國主義的機器打碎而不是單把它從一手移轉於他手底一個企圖。他對於普魯東派與勃朗基派所領導的『英·勇·的』巴黎工人，唱了一首真實的讚美歌。

他寫道：

『這些巴黎人有何等的機動能力，何等的歷史的創造力，何等的犧牲能力呵！……在歷史中，從沒有過這樣偉大的例子。』



馬克思超越一切地，珍視羣衆底歷史的創造力。只要我們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能從馬克思學到如何去賞識俄國工人農民在一九〇五年十月與十二月間所表現的歷史的創造力，那就好啊！

這個淵博的思想家（他六個月之先就已預料到失敗）對於羣衆底歷史創造力之尊敬，與無生命的、無靈魂的、迂腐的話『他們原不應動用武器呵』相較，豈不是有天淵之別嗎？

而且，在倫敦過着流亡生活的馬克思，像羣衆鬥爭底一個參加者一樣，對於這個鬥爭，他是以前一切他所持有的熱忱與情感加以反應的，從事批評那些進備『翻天覆地』『傻勇的』巴黎人所採取的當前步驟。

呵！我們現在馬克思主義者中的『現實主義的』冒稱聰明的人，嘲笑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的革命的浪漫主義，不知他們將怎樣嘲笑着那時的馬克思啊！對於這位向『翻天覆地』的『企圖』表示尊敬的唯物論者與經濟學者（他是烏託邦底敵人）不

知他們將加以怎樣的嘲笑啊！爲着他的這種反抗傾向，這種烏託邦主義等等，爲着他的這種對於『翻天覆地』的運動底重視，不知這些『蒙着頭的人物』（註）將會給他流多少眼淚，將會給他以怎樣卑謙的微笑或哀悼呵！

但馬克思的頭腦，並沒有裝滿這些瘟豬的聰明（這些瘟豬害怕討論較高形式的革命鬥爭底技術）他恰恰在討論着起義底技術的問題。防禦呢？進攻呢？他這樣地問着，好像軍事的行動是發生於倫敦城外一樣。他決定道，一定要進攻：『他們應該立即向凡爾賽進攻……』

這是寫於一八七一年四月，離大的流血的五月還有幾個星期。

起義者既已開始其『翻天覆地的』『絕望的蠢舉』（一八七〇年九月所說的話）——『他們應該立即向凡爾賽進軍。』

（註）契訶夫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他不論春夏秋冬都蒙着頭部，一聽到自由主義的改良建設，就一定說：『我希望不會生出什麼壞的結果。』

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他們原不應動用武器，去用武力反抗那種要想奪回他們已得自由的最初企圖。

是的，普列哈諾夫自比於馬克思，不是無因的呵！

馬克思繼續他的技術的批評說：

『第二個錯誤，中央委員會（注意：這是指軍事的領導是指國民軍底中央委員會）把權力放棄得太早。』

馬克思知道怎樣警告領袖們不要發動未成熟的起義。但他對於『翻天覆地』的無產階級，是抱着一個實踐顧問底態度，羣衆鬥爭參加者底態度，這些羣衆，不管勃朗基與普魯東底謬誤的錯誤理論，還是把整個的運動提到一個較高的階段：

他寫道：

『雖是如此，這一次的巴黎起義即使它被舊社會底狼、豬和惡狗們所壓倒，——還是我們黨從巴黎六月起義以來的最光榮的行爲。』

馬克思並不對無產階級掩飾巴黎公社底任何一個錯誤，他把一本著作題奉獻給這個偉業。他的這本著作，直到現在還是爲爭取『天』而鬥爭的最好的指南，而且是自由主義的和急進主義的『豬』所最怕的巨物。

普列哈諾夫奉獻給十二月事變的『著作』，却幾乎成爲立憲民主黨人（俄國資產階級的黨——譯者）底聖經。

是的，普列哈諾夫自比於馬克思，不是無因的呵！

顧格曼顯然是寫了回信給馬克思，表示某些疑問，認爲這一事業，是沒有希望的，並把現實主義拿來與浪漫主義相比，——至少他把巴黎公社這起義與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較。

馬克思立即（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給顧格曼一頓嚴厲的訓詞。

他寫道：

『如果鬥爭只在一定順利的機會底條件之下才去進行，那末，世界歷史就定是很易

被造成的了。』

在一八七〇年九月，馬克思稱起義爲絕望的蠢舉。但當羣衆已經起來時，馬克思就要和他們一同前進，要和他們一同在鬥爭過程中學習，而並不向他們作一番官僚主義的訓斥。他知道要想在事先就把機會估計得完全正確，這是吹牛或是無希望的迂腐。他以爲工人階級英勇地自我犧牲地拿起主動權製造世界歷史，其價值是超乎其他一切之上的。馬克思從那些製造歷史但不能在事先就把機會估計得毫厘不差的人們底立場來觀察世界歷史，而不是從一個用『這是很易預料的……他們原不應動用……』這類的話去教訓人的知識分子的俗人底立場來觀察世界歷史。

馬克思善於珍視這樣的事實，就是在歷史中會有這樣的時機，羣衆甚至爲了一個無成功希望的目標而拚命奮鬥；但這爲了給這些羣衆更進一步的教育，爲了訓練他們準備下一次的鬥爭，還是必要的。

對於這問題作如此說法，對於我們的現在的偽馬克思主義者，在原則上是不可理解

的，甚至是格格不相入的；這些偽馬克思主義者喜歡引徵馬克思的話，但只爲要學習如何去估計過去，而不是爲要獲得如何去造就將來的能力。甚至當普列哈諾夫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之後開始『阻止』起義的時候，他也還沒有想成這個樣兒。

但馬克思所提出的，正是這個問題，而他絲毫也沒有忘記他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是把起義視爲絕望的蠢舉的。

馬克思寫道：

『凡爾賽的資產階級的棍徒……要巴黎人在二者之中選擇其一：或是接受挑戰，或是不戰而降。不戰而降，是使工人階級瓦解，其不幸比喪失任何數目的首領還要大得多。』我們用這話來結束我們對於馬克思在其致顧格曼信中所指出的教訓（值得無產階級採取的政策教訓）之簡短評述。

俄國的工人階級，已證明了一次，而且還將不止一次地證明，它是有能力來『翻天覆地』的。

